

愛倫凱在中國： 文化轉譯與性別化論述*

許 慧 琦**

摘 要

本文嘗試突破過去研究瑞典教育家愛倫凱(1849-1926)的框架，一反以往高度集中於五四階段、文學創作與男性論述，企圖從較長時段、多元史料、與兩性著述的新視角出發，考察愛倫凱在民國時期被轉譯與回應的過程及其歷史意涵。在探究中國論者對愛倫凱思想的取捨、轉化、理／誤解、情境化與批判等言論之際，我也將

* 筆者感謝學友陳世榮與黃雪蕾以及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言。全文文責，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1年9月2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12月8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對這些論者如何回應與評論愛倫凱學說，進行性別化的分析，以呈現民國女性主義的異質性。為此，我不跟隨之前學者只以男性中心的政治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做為女性主義的分類依據，而搭配以凸顯性別化意涵的「男性本位」與「女性本位」思維差異，來辨識與分殊不同作者的論述本質。

本文將闡明，置身中外、新舊因素交織情境下的民國男女作者，透過與愛倫凱學說的對話，各自發展出以母權、女權、或人權為重的異質婦女解放與兩性論述。其中，愛倫凱的戀愛觀與母性論，不僅成為五四及其後中國男性本位女性主義的首要理論依據，也激發過去被學界忽略的女性本位女性主義思維。在這個對愛倫凱學說從高度讚揚與全盤接受，到質疑批評與拒絕採納的思想光譜中，見證了民國論者譯介外來思想的受容程度、反思性與創生力。

關鍵詞：愛倫凱、女性主義、戀愛觀、母性論、文化轉譯

前言

近二十餘年來，中外學界在近代中國婦女與性別史領域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在民初被翻譯與接受的外國思想家個案；1920年代深刻影響中國知識菁英的瑞典教育家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即為一例。從白水紀子(Noriko Shirouzu)1995年發表〈《婦女雜誌》所展開的新性道德論——以愛倫凱為中心〉，到趙雅研2019年的碩士論文〈「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顯示愛倫凱學說在五四中國曾發揮的啟蒙影響，受到文史專家頗多關注，所作研究評述亦見多元化。¹ 白水紀子清楚點出，「愛倫凱是談論中國20年代女性解放思想必須要論及的一個人」。² 中國現代文學專家劉慧英提綱挈領地歸結，從1920到1925年初，銷量高、影響廣的上海《婦女雜誌》「從愛倫凱那裡接受了『靈肉一致』的戀愛婚姻論，同時也

-
- 1 例見白水紀子，〈《婦女雜誌》所展開的新性道德論——以愛倫凱為中心〉，收入吳俊編譯，《日本現代中國文學論：東洋文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507-527（該文原載於《橫濱國立大學人文紀要》第二類語學·文學，第42輯，1995年10月）；趙雅研，〈「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9年5月）；Yung-chen Chiang, “Woman,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25,” *Gender and History* 18:3 (November 2006), pp. 519–545；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5（2012年），頁87-101；張鵬燕，〈愛倫凱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河北學刊》，卷32期5（2012年9月），頁101-104；張鵬燕，〈愛倫凱與中國現代文壇〉，《新文學史料》，期1（2013年），頁159-168。
 - 2 白水紀子，〈《婦女雜誌》所展開的新性道德論——以愛倫凱為中心〉，頁508。

接受了她關於『母性』和『生育神聖』的觀點，從而建構起一套有關『新女性』的價值標準。³ 英國華裔作家潘翎(Lynn Pan)在其 2015 年問世的《當真愛來到中國》(*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裡，將 1920 年代前半期《婦女雜誌》的主要男性作者群，稱為「女性主義者」(feminists)，他們「將愛倫凱尊為新性道德的代言人」。⁴ 美國華裔史家江勇振也表示，當時《婦女雜誌》的主編章錫琛(1889-1969)與周建人(1888-1984)、沈雁冰(1896-1981)等人，「都相信愛倫凱的想法代表了西方最進步的婦女運動」。⁵ 另一位中國現代文學專家楊聯芬，在其 2016 年出版的《浪漫的中國—性別主義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評論「她(愛倫凱)的戀愛理論被新文化倡導者尊為『愛情教』，是五四戀愛神聖論的來源」，「在新文化所借用的西方性別理論中，愛倫凱的理論影響最大」。⁶ 楊聯芬及其他大陸學者與研究生(例如張鵬燕與趙雅研)，也探討愛倫凱的思想如何啓發與影響五四新文學。此外，上述研究多不忘指出日本學者，特別是本間久雄(Honma Hisao, 1886-1981)與廚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 1880-1923)，在引導中國知識菁英詮釋

3 劉慧英，〈從《新青年》到《婦女雜誌》——五四時期男性知識分子所關注的婦女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期 1 (2008 年 2 月)，頁 118-126。

4 Lynn Pan,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1.

5 江勇振，〈女性、母性與生物界通律：《婦女雜誌》的前半期〉，收入王政、高彥頤主編，《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頁 58-97。

6 楊聯芬，《浪漫的中國——性別主義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頁 95、121。

與接受愛倫凱學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江勇振便依據《婦女雜誌》譯介愛倫凱、批判西方婦女參政運動等舉措，論證當時中國的兩性論述乃「全球社會性別話語的一環」。⁷

這些關於愛倫凱的研究成果，雖增進吾人對五四中國婚戀與性道德文化的理解，但在考察時段、討論對象與研究取徑各方面，仍有待開展，以期較全面地評估愛倫凱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影響。首先，上述研究僅聚焦於愛倫凱學說在五四（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中期）中國的譯介與傳播。幾位大陸學者先後指出，對照愛倫凱於五四時期「異常『走紅』」或「熱銷」，1930年代之後則形同「銷聲匿跡」，這種說法缺乏充分的史料佐證，有待商榷。⁸ 楊聯芬以李君毅1931年夏發表的〈從愛倫凱到柯倫泰〉標題，作為她所謂的「命題」，指稱「大革命以後，愛倫凱從中國女性問題及兩性道德討論的核心位置悄然引退」，代之而起的是1930年代「脫穎而出」的俄國女革命家柯倫泰 (Alexandra Kollontai, 1872-1952)。⁹ 如此論斷，不只忽略柯倫泰1930年代之前已開始在中國發揮思想影響力，也使愛倫凱著述的譯介與傳播

7 江勇振，〈女性、母性與生物界通律：《婦女雜誌》的前半期〉，收入王政、高彥頤主編，《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頁84。

8 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5（2012年），頁99-100；趙雅研，〈「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9年5月），頁39。

9 楊聯芬，《浪漫的中國——性別主義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頁315；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5（2012年），頁99。關於楊聯芬所引用的李君毅文，見李君毅，〈從愛倫凱到柯倫泰〉，《婦女雜誌》卷17期7（1931年7月），頁131-137。

之研究停留在五四到 1920 年代，缺乏較長時段的檢視。¹⁰ 張鵬燕則指出「中國大規模、系統化地譯介愛倫凱的思想與著作是在 1920 年代，並一直延續到〔中共〕建國前」，並聲言「愛倫凱影響中國思想界的同時，也影響著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文學創作」，¹¹ 但她並未引用任何 1930 與 1940 年代介紹愛倫凱的中文著作，這個論點還需要史料加以證實與闡釋。

其次，在評估愛倫凱思想對中國的傳播與影響這部分，目前的研究成果，除了鎖定《婦女雜誌》或少數其它五四階段的報刊，研究範疇絕大多數僅止於文學創作，鮮少觸及其他文類。愛倫凱在這些學者所檢視的文藝作品中，幾乎不曾現身；但他們宣稱在 1920 年代文學作品主角的戀愛言行中，發現「隱藏著愛倫·凱思想的魅影」，或「顯現著受愛倫凱在中國傳播影響的痕跡」。¹² 與此同時，1920 到 1940 年代真正論及愛倫凱的史料，如名人傳記、時人論著、女子教科書與報刊媒體等，至今尚無學者進行綜合研究與評述。

再者，除了上述大陸學者分析的民初女性小說家，過去

10 關於柯倫泰在 1920 年代中國的譯介等研究，見陳相因，〈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 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2011 年 12 月），頁 1-31；陳相因，〈嫺嫻、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學——論〈三代之愛〉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跨文化實踐與文學實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54（2019 年 3 月），頁 75-113。

11 張鵬燕，〈愛倫凱與中國現代文壇〉，《新文學史料》，期 1（2013 年），頁 160。

12 趙雅研，〈「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頁 25-32；張鵬燕，〈愛倫凱與中國現代文壇〉，《新文學史料》，期 1，頁 159-168。

學界的愛倫凱研究，幾無例外地將注意力集中於主要譯介者——中國知識男性之論述，忽略知識女性在回應乃至挑戰愛倫凱學說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從白水紀子以降，學者主要關注的，是以《婦女雜誌》（間或及《民國日報·婦女評論》或《東方雜誌》）為主要陣地的男性知識份子，如何引進、闡釋與發揚愛倫凱的學說，包括以筆名「茅盾」聞名的沈雁冰、其弟沈澤民(1900-1933)、李三旡、章錫琛、周建人與吳覺農(1887-1989)等人。至於曾在 1930 與 1940 年代的報刊或專書中，引述與評論愛倫凱思想，或行文有「愛倫凱味」（借用張鵬燕之語）的中國女性論者，舉凡金石音、陳碧蘭(1902-1987)、孫嵐、沈慧蓮(1891-1974)、金克蘭等，則從未獲上述學者青睞。事實上，這些知識女性回應愛倫凱學說的著述，關鍵地映證愛倫凱思想在訓政到抗戰階段的中國仍有其影響。

本文嘗試突破過去愛倫凱研究高度聚焦五四階段、文學創作與男性論述等框架，擬耙梳多元史料，從較長時段與兩性著述的新視角出發，考察愛倫凱在民國時期被轉譯與回應的過程及其歷史意涵，並修正前人研究的論點。捷克文學理論家 Jiří Levý 指出，「translation」——中文多以「翻譯」名之一意味著將某一語言的知識傳輸到另一語言時的溝通與決策過程。¹³ 文化情境、思維方式、文法結構、詞彙選擇與認知判斷等眾多元素，都可能影響翻譯者的成品內容。至於譯介，即「翻譯與介紹」，則賦予當事人更大的自由，選取

13 Jiří Levý,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48-159.

被翻譯的原典作品，加以闡釋與發揚。臺灣史家張寧在其專書《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中，用「轉譯」取代「翻譯」，以強調「文化移轉時顧此失彼甚至暗渡陳倉的情況」。換言之，張寧擴大了常人對「翻譯」較狹隘的認知，凸顯「translation」在跨文化／語言過程中，涉及的「轉化、演變、本土化、異化」等多重意涵。¹⁴ 本文呼應張寧對「轉譯」的詮釋，以「文化轉譯」來指涉中國論者在譯介愛倫凱作品的過程中，對其思想的取捨、轉化、理／誤解、情境化與批判等言論。

探究愛倫凱在中國的文化轉譯歷程時，不應忽略性別向度的重要性。將性別做為分析範疇，至少有兩層歷史意涵應予注意。第一，當我們不只關注知識男性譯介者，也重視屬於回應者的知識女性之言論時，才能真正評估外來思想進入中國後的發展與演變的時代意義。從愛倫凱的個案來看，早期中國的譯介者確實都是男性，至於援用、衍申或批評其論述者，則兩性皆有；因此，吾人不應簡單地將男／女的生理性徵(sex)視為區隔「主動譯介」與「被動回應」的判準。本文將說明，在既有兩性觀積澱深厚的中國社會中，男女論者各自挪用愛倫凱學說，表述自己的觀點，這般受傳統性別文化制約的思維，在批舊迎新的觀念轉變與盱衡時局的過程中，出現「因（生理差異）性而（在言行有）別」，亦即具社會性別特質的言論表述，我名之為「性別化論述」。¹⁵ 在

14 張寧，《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頁4-13。

15 關於「性別化論述」的詮釋，參見 Jane Sunderland, *Gendered Discours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20-22.

討論性別元素如何影響這些論者的觀點之際，我也將盡可能考慮世代、婚育狀況、意識形態等其他變項，綜合分析其人迎拒愛倫凱思想之因。

第二，當我們檢視這些中國作者的性別化論述時，可更清楚地理解民國時期多元女性主義的聲音及彼此間的競逐。大約自 1999 年王政出版《中國啓蒙運動中的婦女：口述與文本歷史》(*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以降，美、日漢學界與大陸史學界出現不少溯源與梳理女性主義(feminism)在近代中國發展的著作。¹⁶ 本文採用「女性主義」，而非大陸婦女與性別史學者較常使用的「女權主義」來逐譯「feminism」一詞，原因有二：一為該詞經日、英文作品初入中國之際，時人曾譯為「女子主義」、「婦女主義」，甚至音譯的「弗彌涅士姆」等字眼，並未獨以「女權主義」為尊；二為臺灣社會沒有馬克思唯物史觀等意識形態的包袱，基本上不曾出現「女性主義」與「女權主義」概念之爭，主要以前者為譯詞。此外，針對本文檢視的民國時期論者「基於兩性平等的前提來主張女性權益」的言論，我以「女性主義」而非「女權運動」概括之，乃在於她／他們主要以文字書寫闡揚論點，而不盡然參與組織，或以行動推廣其女性主義思想。我希望對這些論者如何

16 例見 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陳雁，〈從矛盾的翻譯到矛盾的立場：女權主義術語在近代中國的翻譯與流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1(2013 年)，頁 105-114；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王政、高彥頤主編，《女權主義在中國翻譯歷程》。

回應與評論愛倫凱學說，進行性別化的分析，以呈現民國女性主義的異質性。為辨識與分殊不同作者的論述本質，我凸顯性別化意涵的「男性本位」與「女性本位」之思維差異，以別於先行研究只以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男性中心的政治哲學，作為女性主義的分類依據。這些受後天影響發展出的「因性而別」的觀點，並不依著生理性徵劃分；在男性長期主導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社會體制中，許多女人的觀念是受「男性本位」形塑的。因此，當女性論者接受傳統中國兩性分工的社會秩序——即男主外女主內、且允許男性有更大社會優勢與支配程度的意識形態，她所發表的女性主義論點，實帶有「男性本位」思維。至於少數女性作者甘冒大不韙，與主流男性意見相左，直指既有兩性分工準則對女性的不利之處，並由此論述女性應可發展的新角色與社會空間；這些主張，即本文所謂「女性本位」的女性主義。但我也發現當時某些知識女性的論述，雖未挑戰兩性分工的原則，卻質疑此一原則所蘊含的男優女劣或男強女弱的價值觀。這類女性主義論述本質，由於已意識到既有性別秩序對女性發展的侷限性，也可被歸為「女性本位」。換言之，本文所指涉「男性本位」或「女性本位」思維，是以社會發展為中心來認知與判斷的。中國的兩性論者如何經由消化愛倫凱的思想，反芻出不同社會性別本位與主體意識的思維，將是本文的討論重點。

民國時期有關愛倫凱的豐富史料，提供史家研究「某人的思想如何影響他人」的適切個案，並允許我發展出具演進層次的論述檢視架構，以作為思想文化史的方法論。有鑑於過去學者研究愛倫凱在中國，主要基於對文藝作品的分析，

本文將重點析論民國時期為數眾多且文類多元的非小說(nonfiction)社會論述(social discourse)，以探查愛倫凱思想的蹤影，並評估中國論述的回應與衍變。這些非小說的社會論述，包括出現在報章期刊、專書、散文、名人傳記乃至教科書中的文本。根據這些史料，我得以辨識中國論者接受愛倫凱學說的五種論述模式，即介紹字詞、引用文句、形成語境、闡述概念與實際應用。換言之，本文對愛倫凱的學說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及其影響之研究，將著重考察當時相關論述的字詞檢索、文句辨識、語境判別、概念分析與應用該學說。透過此一個案研究，我希望示範這樣的多層次論述檢視法，結合上述的文化轉譯與性別化分析，如何系統且脈絡化地開展跨語際的思想文化史研究。

本文將闡明，民國男女作者置身中外新舊因素交織的情境下，透過與愛倫凱學說的對話，各自發展出以母權、女權或人權為重的多元女性主義論述。其中，愛倫凱的戀愛觀與母性論，不僅在 1920 年代前半期主導形塑出我稱之為「男性本位母性主義的女性主義思維」，也從當時到 1930、40 年代，激發以往不為學界重視的「女性本位女性主義思維」。而在男性或女性本位思維的範疇中，都分別存在著強調女性不同權益的異質女性主義訴求。在這個從高度讚揚與全盤接受愛倫凱學說，到質疑、批評與拒絕採納的思想光譜中，見證了民國論者譯介外來思想的受容程度、反思性與創生力。

一、發現與定位愛倫凱

愛倫凱之名及其學說進入民初中國時，五四新文化運動

甫萌芽，進步的知識菁英開始從日本與歐美等國汲取婦女解放運動的資訊亦不久，從執政者到傳統禮教文化，阻礙女權發展的勢力猶大。清末受民族主義與革命精神啓發女權意識的部分知識女性，在民國共和肇建後，奮力推進婦女參政運動，卻因當局鎮壓、社會各界反對、革命男同志不支持，連孫中山亦愛莫能助，最後以失敗告終。¹⁷ 曾經透過辦報或組織，積極參與清末改革與革命運動的女界，在民初沉寂一時；隨之而起的是北大師生主導的新文化運動，及其以報刊爲主要媒介，所推動的婦女問題討論熱潮。愛倫凱的學說，便是在新文化與婦女解放思潮交織的 1910 年代進入中國。

愛倫凱出生於瑞典政治貴族世家，早年多接受家庭教育，熟稔多國語言，勤奮自學，遍閱歐洲經典著作。盧梭、孔德、歌德、達爾文、彌爾、尼采等進步思想家，影響她放棄基督教信仰而接受進化論，並終身強調自由表達、個人獨立發展與家庭及道德教育的重要性。¹⁸ 她在 30 歲之後，因家道中落，開始投身教育事業，也逐漸發展她的作家身分，她針對廣泛的教育與女性問題所發表的論見，被瑞典社會目爲大膽(daring)與反傳統(iconoclastic)。¹⁹ 愛倫凱真正發揮國際（包括對中國）影響力的作品，主要是她在中晚年所出版的專書，其中不少被譯成英文，諸如《戀愛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 1911)、《兒童之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17 魏雲，〈民初女子參政失敗原因考察〉，《湖南科技學院學報》，卷 30 期 3（2009 年 3 月），頁 25-27。

18 Thorbjörn Lengborn, "Ellen Key (1849-1926)," *Prospect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23:3-4 (1993), pp.825-837.

19 "Publisher's Note," in Ellen Key, *Love and Marriage*, trans. by Arthur G. Chater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 1911), pp. iii-iv.

1909)、《戀愛與倫理》(*Love and Ethics*, 1912)及《女性道德及其他論文》(*The Morality of Women and Other Essays*, 1911)等。愛倫凱不滿瑞典(與歐美)婦運亟於爭取女性人權卻輕忽其母性,因而基於自身的優生進化觀、生理決定論與個人主義信念,加以回應。這些觀念,加上她強調兒童發展的家庭、環境與生命教育論,共同形塑她以闡揚母性為基調的女性主義思想,並進一步成為她論述理想婚戀、兩性新道德與社會未來樣貌的核心。²⁰ 愛倫凱堅持,女性的解放應以發揚廣義且具有社會意義的母性為主,俾便在自身解放之餘,達到兼顧改造男性、改革家庭與改善社會的利人利己目標。²¹ 她申言女性不應自我貶抑,只求以男性為摹本來發展人生;當女性獲得人類應有的公民權時,必須擺脫弱化女性的傳統性別框架,理直氣壯地承擔女人作為「民族母親」(mothers of the race)的身分與任務。²² 因此,愛倫凱無意將女性的活動空間侷限於家庭,而是強調女性可透過兼具社會與家庭意涵的母親角色,以實現自我、造福社會與進化種族。對她而言,她最注重的女權訴求——女性獨立自主及母性天職,可在政府承認家務工作的社會價值,並給予女性酬勞的條件下,共同達成。²³ 換言之,愛倫凱從來不是只基於個人私利闡揚女

20 Thorbjörn Lengborn, "Ellen Key (1849-1926)," *Prospect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23:3-4, pp. 825-837.

21 Ellen Key, *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trans. by Francis Maro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9), 63-105.

22 Havelock Ellis, "Introduction," in Ellen Key, *Love and Marriage*, pp. vii-xvi.

23 Tatiana V. Dahlgren, "Ellen Key in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Kyoto Conference on Japanese Studies 1994 III* (March 25 1996), pp. 261-269, URL: <http://doi.org/10.15055/00003561>.

性解放，而是從兩性共利與造福社會的理念出發，主張婦女的自主與適（生理）性發展。不過，愛倫凱雖然強調女性完整人格必須以經濟獨立為前提，但她所謂「在最近的將來，尤其是在實現了社會主義以後，自立就會實現的」之語，顯然是尚未達成的未來願景。她的神聖、優生母性論，女性在沒有經濟基礎下，容或無法真正自立。因此，當她的著作自 19 世紀末開始，從歐陸向美國與東亞傳播時，她的理想在與不同社會現實交會下，即產生思想轉化與曲解。

本節將先梳理愛倫凱學說譯介初期的歷史脈絡，以說明愛倫凱思想的關鍵字詞、重點文句與論述語境，即華人接受其學說的第一到第三種論述模式，如何經由中國知識男性的著作，現身中國社會。依據史料，將章錫琛把《婦女雜誌》轉型為愛倫凱學說代言刊物的前一年，亦即 1920 年，界定為知識男性主導日後中國社會詮釋愛倫凱的定位年。我集中檢視沈雁冰與章錫琛這兩位主要的初期引介者，如何從西方婦女解放運動與女性主義流派的發展，來定位愛倫凱學說在中國被發揮的方向。本節將說明：一，早期愛倫凱的學說並不僅如張鵬燕所言，「是由日本傳播到中國的」，而是同步來自英文與日文作品；二，當時愛倫凱被譯介的思想重點，也不像楊聯芬所稱，只「集中在戀愛論」，母性論同樣受到《婦女雜誌》論者的高度重視。²⁴

愛倫凱的中文傳記初現於中國的時間，至遲為 1914 年，早於幾位大陸學者認定的 1918 年；且提及愛倫凱的初期中

24 張鵬燕，〈愛倫凱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河北學刊》（2012 年），卷 32 期 5，頁 101；楊聯芬，《浪漫的中國——性別主義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頁 33。

文著述，並未顯示受到日文作品或日本作家的影響。楊聯芬、張鵬燕與趙雅研都將陶履恭(1887-1960)在 1918 年初刊載於《新青年》的〈女子問題——新社會問題之一〉，視為最早介紹愛倫凱的作品。²⁵ 其實早在 1914 年 10 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誌》，便刊登了「无我」所撰〈大教育家愛倫該女史傳〉。此篇傳記首次觸及後來沈雁冰與章錫琛等人詮釋愛倫凱學說的重點：女人應以異於男人的「母性」本能、而非強調與男人相同的「人性」，去爭取與男人平等的權利與社會地位。²⁶ 相形之下，陶履恭在〈女子問題——新社會問題之一〉文中，以「克倚女士」稱呼愛倫凱，只提及其名，未述及其人學說。²⁷ 1919 年，北大學生羅家倫(1897-1969)在《新潮》發表的〈婦女解放〉，雖引用了愛倫凱《戀愛與結婚》及《戀愛與道德》兩本書的英文版，強調既有婚姻體制的不道德，卻把她誤植為「德國大教育家」。²⁸ 同年 2 月，《婦女雜誌》刊載袁念茹著〈愛倫幹女史傳〉，該傳並未涉及愛倫凱的思想，且誤以為終身未婚的愛倫凱已婚還有子女，文章價值不高。²⁹ 11 月，上海南洋公學學

25 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 5（2012 年），頁 89；張鵬燕，〈愛倫凱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河北學刊》，卷 32 期 5（2012 年），頁 101；趙雅研，〈「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頁 15。

26 无我，〈大教育家愛倫該女史傳〉，《教育雜誌》，卷 6 期 7（1914 年 10 月），頁 29-34。

27 陶履恭，〈女子問題——新社會問題之一〉，《新青年》，卷 4 期 1，（1918 年 1 月），頁 14-19。

28 羅家倫，〈婦女解放〉，《新潮》，卷 2 期 1（1919 年 1 月），頁 11-31。

29 袁念茹，〈愛倫幹女史傳〉，《婦女雜誌》，卷 5 期 2（1919 年 2 月），頁 1-4。

生朱翹，在其同學會刊物《樵李》雜誌發表的〈男女關係上的解放和改造〉，也許是中國首次引用愛倫凱關於「有戀愛的婚姻才屬道德」的名言：

以前有位瑞典的女流思想家名叫依編克怡，他視戀愛為一切性的道德根柢，從而定次之一種律例。曰：「凡結婚若有戀愛，即為道德。雖經法律上許多的經過而無戀愛，即為不道德。」照這樣說來，則結婚之為道德與不道德，全視戀愛的有無。³⁰

上述幾篇文章，開始舉出愛倫凱論點，並引用其文句，在女子問題、婦女解放、改革婚制與改造道德等課題，發揮己見。除了首篇无我的文章專門介紹愛倫凱之外，其他作家只是讓愛倫凱作為支持自身論點的某一新思想權威，短暫現身，然其學說樣貌仍非常模糊。不過，重視婦女與婚戀課題的進步學生領袖羅家倫，1919年春點名批評《婦女雜誌》「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導致該刊換主編、改風格，間接為愛倫凱學說等外國新思潮在中國傳播，開闢坦途。³¹

真正為愛倫凱的學說在中國奠下知名度、並較深入譯介與闡述其思想的允為沈雁冰，他當時已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三年多，日後在藝文界佔有一席之地。1920年，商務出版的《小說月報》與《婦女雜誌》（皆由王蘊章主編），面對強勢的新文化思潮挑戰，不得不改弦易轍，以求生存。自1920年起，沈雁冰接受王蘊章請託，在《小說月報》提

30 朱翹，〈男女關係上的解放和改造〉，《樵李》，卷1期2（1919年11月），頁21-26。

31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卷1期4（1919年4月），頁623-632。

倡新文學，並在《婦女雜誌》談婦女解放問題，可謂帶領此二雜誌朝改革方向前進的引路人。³² 1920年2月，沈雁冰先在〈男女社交公開問題管見〉中，簡要提及愛倫凱創造兩性間合理新道德的主張，以作為國人提倡男女社交公開的學理依據之一。³³ 3月，他以筆名「四珍」，在《婦女雜誌》發表首篇愛倫凱著作的中文翻譯〈愛情與結婚〉，又為9月份的《東方雜誌》寫了〈愛倫凱的母性論〉專文。³⁴ 此外，沈雁冰在1920年3月與8月號的《婦女雜誌》，各發表一篇論述婦女解放問題與婦女運動的文章，顯見當時他視愛倫凱為中國婦女求解放應效法的先驅者。在第一篇〈我們該怎樣預備了去談婦女解放問題〉中，沈雁冰回顧婦女問題在西方社會的發展情形，並分殊婦女解放之物質與精神兩大層面，他指出：「瑞典有位愛倫凱(Ellen Key)女士對於女子主義運動是終身事業，討論新道德極精關的。」³⁵ 在文末，沈雁冰表達他對如何研究婦女問題的觀點，如「我們不可不知西洋女子主義的起源，分派，趨勢，現在和將來」，這句話預示了他與章錫琛等人日後在《婦女雜誌》談婦女問題的態度與方法：即借重歐美女性主義與婦運的歷史進程，為中國當時及未來的相關發展指路。8月號的〈婦女運動的意義和要求〉一文，更明確展現沈雁冰對愛倫凱思想的青睞。他借

32 茅盾，《茅盾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96-99。

33 雁冰，〈男女社交公開問題管見〉，《婦女雜誌》，卷6期2（1920年2月），頁1-4。

34 四珍，〈愛情與結婚〉，《婦女雜誌》，卷6期3（1920年3月），頁1-12；雁冰，〈愛倫凱的母性論〉，《東方雜誌》，卷17期17（1920年9月），頁57-64。

35 雁冰，〈我們該怎樣預備了去談婦女解放問題〉，《婦女雜誌》，卷6期3（1920年3月），頁1-5。

愛倫凱的思想，提醒讀者不應對婦女運動存有某些誤解，其中包括「切莫認婦女運動是有反抗男子敵視男子凌駕男子的意味」。³⁶ 沈雁冰一來從西方婦女運動流派發展的脈絡，凸顯愛倫凱思想的價值，二來透過愛倫凱的論見，批評社會主義與參政運動等其他女性主義的偏差。沈雁冰這幾篇文章，肯定愛倫凱基於女人異於男人的天性與人格獨立而發的戀愛論、母性論與新性道德觀。

與此同時，章錫琛亦被商務印書館高層交付革新報刊的任務，從而開始接觸並推介愛倫凱。章錫琛當時已服務於商務且擔任《東方雜誌》主編長達8年，但他真正投入有關婦女問題的研究，主要始於1920年代之交。1920年底，他在《婦女雜誌》發表了3篇論文（包括1篇日文譯作），開始提及愛倫凱。第一篇〈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觀與戀愛觀〉，開宗明義地揭櫫「性的道德，實在是女子覺醒的中心問題」，以及「真意義的戀愛」是「所謂靈肉一致的戀愛」。這二個論點正是章錫琛領導《婦女雜誌》期間，討論婦女問題的基調。他聲明，「能夠從正面最大膽最徹底」地主張「婦女解放、自由離婚、戀愛自由等婦女問題」的近代西方思想家，當屬愛倫凱。接著，他開始介紹愛倫凱以戀愛為核心、不以法律為依據的新性道德論述，含攝著戀愛、結婚與離婚自由。在文末「戀愛思想的變遷」一節，章錫琛也以愛倫凱認為戀愛「不但在保存種族，並且要完成人格」的見解，為西方古今眾思想家中最進化或最值得效法者。³⁷ 第二篇〈性的

36 雁冰，〈婦女運動的意義和要求〉，《婦女雜誌》，卷6期8（1920年8月），頁1-6。

37 瑟廬，〈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觀與戀愛觀〉，《婦女雜誌》，卷6期10（1920年10月），頁1-8。

道德底新傾向〉，譯自日本文學專家本間久雄的作品，其內容彷彿〈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觀與戀愛觀〉論點的深化，將男女性道德視為社會關係中應解決的首要問題，並論證自由離婚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³⁸ 在同一期《婦女雜誌》中，章錫琛另一篇〈羅素與婦女問題〉，也提及當時處於「新舊道德」爭議焦點的自由離婚，且再度援用愛倫凱「用戀愛的有無做標準」，以及自由離婚名言「凡人不能約束永久的戀愛，和不能約束長壽相仿」，來評價羅素的觀點。³⁹

綜上可知，沈雁冰與章錫琛在 1920 年的相關著述，不僅正式介紹愛倫凱學說精髓的關鍵字詞、引用其著名文句，更結合其自身的社會改革傾向，創造出有利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發展的新論述語境。沈、章在執行改革刊物、討論婦女問題的任務之初，不約而同選擇愛倫凱，在他們眼中，她當是對於解放婦女、革新道德、改善社會與進化種族提出精闢卓見的思想家。而愛倫凱的學說之所以能在眾多外國思想家中脫穎而出，受沈、章青睞，是因為她的本質論女性主義 (essentialist feminism) 思維與眾多中國知識男性的觀點高度吻合。所謂「本質論女性主義」，簡言之，即以男女之生、心理本質上不同為基礎，來為女性爭取與男性平等的自由與權利。從本質論出發、強調女性不同於男性的特質，雖可能強化父權體制長久加諸兩性的社會角色，侷限女性的發展空間，但也可能成為女性依照自身需求或利益，爭取賦權

38 本間久雄著，瑟廬譯，〈性的道德底新傾向〉，《婦女雜誌》，卷 6 期 11 (1920 年 11 月)，頁 1-10。

39 瑟廬，〈羅素與婦女問題〉，《婦女雜誌》，卷 6 期 11 (1920 年 11 月)，頁 1-5。

(empowerment)的根源。⁴⁰ 因此，本質論女性主義對女性爭取與男性相同的社會發展機會，如同一把雙面刃。沈雁冰與章錫琛在接觸愛倫凱之前，已對基於男女本質無異（即強調「人性」）的女性主義頗有微詞。章錫琛在 1919 年底的〈婦女之解放與改造〉文中，理所當然地視男女差異為自然天性；此種性別觀，在當時的中國進步知識界頗具代表性。⁴¹ 因此，與其說愛倫凱的著作啓發了沈、章等人分析婦女問題及論述婦女解放之道，不如謂他們欣喜地在愛倫凱的作品中，找到具進化優生意識、兼顧社會與兩性利益、且不違其既有兩性觀的女／母性主義，用以作為挑戰禮教傳統的學理依據。沈雁冰早在 1919 年 11 月號《婦女雜誌》的〈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文中，便已發表某種男性的免責聲明，明言即便像他那般擁護婦女解放的男性，也不會支持女性進行有礙男性利益的解放要求。⁴²

本節論證了中國知識男性如何在廣泛接觸的外國新思潮中，發現享有國際盛名的愛倫凱，並將其定位為討論婦女問題最徹底、提倡婦女解放之道最適切的思想家。正因愛倫凱的著作既充滿淵博睿智且進步的見解，又符合知識男性「在男女和諧分工共謀社會利益的前提下提倡婦女解放」之意念，順利成章地成為這些五四菁英名為破舊立新、實仍維持男性優勢的理論權威。而此一發現與定位愛倫凱的過程，都在章錫琛正式接任《婦女雜誌》主編之前，即已完成。

40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17), pp. 894-895.

41 瑟廬，〈婦女之解放與改造〉，《婦女雜誌》，卷 5 期 12（1919 年 12 月），頁 5-6。

42 佩韋，〈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婦女雜誌》，卷 5 期 11（1919 年 11 月），頁 1-6。

二、演繹愛倫凱

愛倫凱的母性論、戀愛觀與新性道德說，雖在 1921 年之前已獲少數男性知識菁英的注意，但 1921 到 1925 年由章錫琛擔任主編的《婦女雜誌》，無疑為推廣愛倫凱學說，與深化中國讀者理解其思想的主要陣地。章錫琛明確地選擇愛倫凱的思想，作為當時該誌討論女子問題與宣揚婦女解放的精神導師。本節援用不同種類的史料，整體審視民國論者從五四到抗戰時期，如何介紹與演繹愛倫凱的思想，以展現與釐清其對中國的階段性影響。我將闡述，在這 30 餘年間，愛倫凱學說的代表字詞、文句、語境、關鍵概念與（選擇性）應用其思想的論述，即 5 種異質的論述模式，交迭出現，彰顯出愛倫凱之於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影響。這些史料顯示不同於前人研究的論見：愛倫凱的母性論實與其戀愛論相輔相成，且共同受到中國譯介者的重視與宣揚。

本節將透過《婦女雜誌》的個案研究，申論該誌以愛倫凱思想為核心，開展出五四後期以母權為婦女解放訴求的「男性本位母性主義」，以此引領進步派婦女問題論述的主流。王政在《中國啟蒙運動中的婦女》書中，指出五四女性主義強調女人的「人性」，而非兩性差異。她並以「旨在追求女性的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性的平等與新意識」的「自由派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來界定與歸結《婦女雜誌》在章錫琛主編時期的論述。⁴³ 王政以其所謂的「自由派女性主義」，與 1920 年代初因共產黨崛起而漸興的「馬

43 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p. 105.

克思女性主義」相對照，強調後者在中共動員群眾的過程中勢力漸增，但前者仍有其發展空間與影響力。然而，王政過度專注以政治意識形態來劃分女性主義，卻忽略了她所界定的「自由派女性主義」陣營中，存在著立場迥異的兩大派別「女權運動」與「母權運動」。雖然王政確實提及章錫琛是「1920年代少數相信性解放是婦女解放核心的男作家，而他利用《婦女雜誌》來提倡其觀點」，但她並未正視一個事實，即該誌的主要作者群皆將「女權」與「母權」明確區分為當時西洋婦運兩大陣營的主張。即使王政接著將「自由派女性主義」分為「自由派文化女性主義」(liberal cultural feminism)與「自由派社會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socialist feminism)兩類，她仍未凸顯《婦女雜誌》主編群一再強調的重點差異：「女權 vs. 母權」。甚且，王政將章錫琛及與他志同道合的男作家歸類為「自由派文化女性主義者」，並稱他們企圖改變男性中心思維(the mentality of male-centeredness)與文化價值觀，此舉仍舊無視於這些男作家論述中經常流露的男性本位基調。⁴⁴ 換言之，王政凸顯政治與階級元素的女性主義分類，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性別與女權元素來呈現的。

不可諱言，王政的界定頗有見地，卻也容易引起混淆。有鑑於此，本文不採王政之說，而改以「男性本位的母性主義」詮釋章錫琛等人借重愛倫凱著作而闡發的婦女論述基調。誠然，絕非《婦女雜誌》所有作者都援用或擁護愛倫凱的主張，我也同意王政的觀點，認為該誌多方關注與提倡兩

44 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p. 104.

性平權課題。⁴⁵ 但本節的重點，在凸顯這些知識男性如何選擇較符合男性利益的「母權」，而非可能挑戰男性權威或損害男性優勢的「女權」，作為其推動婦女解放的要點，並分析愛倫凱學說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我的研究發現，以章錫琛為首的《婦女雜誌》主要作者群，充分發揮愛倫凱的思想，雙管齊下，進行男性本位母性主義的論述：一方面以戀愛結婚與新性道德為核心的兩性解放之道，還有以發揚母性與愛欲自由為核心的女性解放之道。由於學者對此一「兩性解放之道」的研究成果頗多，本節將聚焦於《婦女雜誌》的「女性解放之道」，申論章錫琛等人的相關論述所顯露的「男性本位母性主義」思維。

章錫琛擔任主編時的《婦女雜誌》(1921-1925)，儼然為行銷愛倫凱思想的代言者；以他為首的主要作者群，大力宣傳愛倫凱學說的價值，同時也策略性地讓愛倫凱為他們選擇的婦女解放路線背書。章承襲前一年他與沈雁冰已展開的論述模式，將愛倫凱定位為西方婦女運動自十八世紀末發展以來，對婦女解放提出最大膽且最徹底思想之人，以此來為該誌宣揚她的學說正名。這些男性菁英，憑藉自身在中國（尚）不受女性挑戰的思想權威與譯介功力，任意詮釋外國論著，來支持他們認為愛倫凱思想最先進的主觀判定，並根據愛倫凱的學說，發展他們眼中最符合兩性雙贏的婦女解放論述，以之呼籲中國女性群起實踐，藉此再度鞏固男性論述權威與社會優勢。

在五四前後湧入中國新文化語境的眾多外國思想家

45 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p. 89.

中，章錫琛獨鍾愛倫凱的戀愛論與母性說。他主導的《婦女雜誌》，透過強力放送如戀愛自由、自由離婚、新性道德等代表字詞，「無戀愛的婚姻不道德」等名句，以及由此衍申的戀愛神聖與尊重母性等觀念叢，系統地闡述愛倫凱學說重點：靈肉一致的戀愛，而非法律，是構成婚姻的唯一道德基礎；相愛男女互信互守的戀愛道德，與戀愛消逝後婚姻即應終止的自由離婚，共同構成新性道德的兩大支柱；而社會人類發達、種族進化，以及個人本質的向上，皆依恃母親的感化力，因此必須發揚母性，提倡母職。⁴⁶《婦女雜誌》在章氏主編期間，至少有 60 篇以上的文章提及愛倫凱的生平或學說，這是其他外國作者不曾享有的待遇。這些作品的介紹模式多元，包括：一、節譯愛倫凱的作品；二、重點闡述愛倫凱某方面的思想，如母權運動、自由離婚與母性教育論等；三、翻譯愛倫凱思想相關的日文著作；四、援用愛倫凱的見解，來發揮自身論點的中文著作；五、綜合介紹愛倫凱的生平及主要學說。章錫琛還透過專文與「自由離婚」或「婦女運動」等專號，創造論述語境，讓愛倫凱的觀點與其他外國思想互動、並凸顯其學說價值。以他為首的幾位男作家，尤其完美接榫愛倫凱的戀愛觀與母性論，將之共同發展為婦女解放的雙核心。他們申言，女人唯有在提升性靈、感受幸福的戀愛中，才能獲致結婚與人生的喜悅；也唯有充分發揮

46 瑟廬，〈愛倫凱女士與其思想〉，《婦女雜誌》，卷 7 期 2（1921 年 2 月），頁 21-27。楊聯芬曾表示，「沈雁冰、吳覺農等特意彌補的愛倫凱『母性論』，在五四新文化的傳播『耗散』中，遭到『自然淘汰』。」但誠如本章此節所引用的史料可證，結合戀愛說與母性論，實為主編章錫琛與周建人青睞的女性解放論調；母性論並未被「耗散」或遭「自然淘汰」。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 5（2012 年），頁 99。

自然的母性，在愛的環境中誕育與教養兒女，才能真正達致實踐自我、家庭美滿、社會和諧與種族進化的理想。⁴⁷

在相當程度上，章錫琛等人確實掌握愛倫凱將戀愛自由與母性復興緊密結合的思想核心；但也正是這群中國男性菁英，在高揚母性神聖與提倡母權之際，對愛倫凱思想進行了重要的文化轉譯。愛倫凱是在西方以爭取人權為主的女權運動「過度發展」之後，藉由提倡母權，糾正兩性衝突與母性式微之弊。反觀她的中國追隨者們，卻是在歸結西方經驗與理論之後，力圖超前部署，在中國以爭取人權為主的女權運動仍「發育不良」之時，便急於以母權訴求來補救甚或替代女權，以預防女權發達可能造成的弊端。換言之，西方從女權到愛倫凱主張的母權運動發展，是個「歷時性」的演進辯證過程；而《婦女雜誌》主要作者群筆下呈現的，卻是女權與母權互相較勁的「共時性」論述空間，這不只壓縮了女權發展的時空向度，也貶低了女權的重要性及其解放女性的意義。這群男性菁英口徑一致，指出近代女性從事的女權運動，導致兩性爭鬥，既是歷史的必然，卻也只是歷史進化的過渡。他們認定，進一步、更理想的歷史發展，必須以兩性共利為前提的母權運動來達成。⁴⁸

《婦女雜誌》此種融合戀愛說與母性論的女性解放之道，以及章錫琛領銜對愛倫凱的文化轉譯，可證諸一個微妙的翻譯舉動。在章氏 1921 年〈愛倫凱女士與其思想〉專文，以及董香白翌年翻譯愛倫凱的〈未來的女子〉文中，不約而

47 吳覺農，〈愛倫凱的母權運動論〉，《婦女雜誌》，卷 9 期 1（1923 年 1 月），頁 74-79。

48 愛倫凱著，董香白譯，〈未來的女子〉，《婦女雜誌》，卷 8 期 9（1922 年 9 月），頁 73-76。

同地出現明顯有別於英譯版的譯文。以下，是譯自瑞典文的英譯本段落，與章文與董文同一段分別的內容對照（粗斜體字為筆者重點標示）：

Therefore the happiness which she will give and experience will be richer, more profound and enduring than anything which up to the present time has been called happiness. *Many traits which belong to the wife and mother of today will probably be lacking in the woman of the future. She will remain always the beloved, the sweetheart, and only so will she become a mother.* She will devote her finest and strongest forces to the difficult and beautiful art of be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beloved and the mother; her religious cult will be to create the supreme happiness of life.

她自己所享受的幸福，給予別人的幸福，比現在所說的幸福更豐富，更深厚，更長久。**她對於男子，永遠做一個情人；而她所以稱為情人的理由，是為著做母親。**所以她對於做母親的技藝，不惜捧出她的最美最強的能力。（瑟盧，〈愛倫凱女士與其思想〉）

所以她享受的和貢獻的幸福，比較現在所稱為幸福的一切東西都更豐富，更深厚，更永久。**這女子，對於男子不論何時成為一個戀人，而且她所以為戀人的唯一理由，就是做母親。**她不惜捧呈她最美最強的力在做戀人同時又做母親的困難的藝術上。她用了宗教的努力，去創造人生最高尚的幸福。（董香白譯，〈未來的女子〉）⁴⁹

49 以上三段引文，分別來自：Ellen Key, *The Morality of Women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y Namah Bouton Bothwick (Chicago: The Ralph Fletcher Seymour Co., 1911), pp. 44-45; 瑟盧，〈愛倫凱女士與其思想〉，《婦女雜誌》卷7期2（1921年2月），頁21-27；愛倫凱著，香白譯，〈未來的女子〉，《婦女雜誌》，卷8期9（1922年9月），頁73-76。

由上可知，愛倫凱原文中的兩句話被章文與董文刪掉了第一句，亦即「許多屬於今日為人妻母者的特質，或許將不見諸未來的女子」。⁵⁰ 章錫琛與董香白都刪掉這句話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兩人皆根據日文譯本翻譯，原日譯本即已刪除這段話，二是兩人都覺得這句話無需翻譯，所以逕行刪除。章、董皆未說明其依據的是英譯或日譯本，但第二個原因不太合理，而且這兩個中譯本內容高度雷同，據此研判，第一種原因的可能性較高。這句話的「消失」，不論出於日文譯者或《婦女雜誌》中譯者的選擇，似乎都透露東亞譯者不樂見「為人妻母者的特質或許將不見諸未來女子」。章文與董文省略了這句話，一來未能完整傳達愛倫凱的女性解放思維，二來顯示譯者在文化轉譯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而他們只譯出的第二句話，則多少反映他們認同愛倫凱將戀愛與母性緊密結合的觀念。

《婦女雜誌》的男作者們，身為支持兩性平等的進步知識分子，從未表達反對女權的立場；然而，他們卻經常流露對中國婦女現狀的失望、對中國婦女運動的批評、以及認定母權運動優於女權運動的言論。章錫琛在 1923 年 1 月推出的「婦女運動專號」，便清楚展現對愛倫凱思想的文化轉譯。該專號首篇由章錫琛以「瑟廬」筆名發表的〈婦女運動的新傾向〉，先指出中國婦運尚在萌芽期，因此應取法先進歐美諸國經驗。他介紹歐美婦運的兩大派，再申論「母權運動為比較女權運動進步」之因：英美主導的女權運動，只重視發展男女同等天性與權益，會造成「性與個人性的衝突」；北歐主導的母權運動，則有助於「性與個人性的調和」。章錫

50 筆者譯文。

琛承認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之間存有巨大落差，所以並未否定女權運動的必要性，但他再三強調，母權運動方為中國更應努力的終極目標。⁵¹ 在「女權」與「母權」的較量下，後者總是獲得《婦女雜誌》主編群的青睞；偶爾出現的異議聲音，則多少受到章錫琛的「後續處理」。例如日後出任上海《民國日報》總編輯的陳德徵(1893-?)，在「婦女運動專號」發表有別於主編群的論見，強調女子經濟獨立應為中國婦運第一步，並批評主張母性自決之人都是「昧於事實講空話」。陳文指責中國有不少把放縱性慾當作戀愛自由且依賴男性的女子，對此，章錫琛以主編身分在該文末附註回應，為愛倫凱式的戀愛自由思想辯護，並強調「推廣性教育」或許比陳的女子經濟獨立主張更能根治該文指責的女性問題。⁵²「婦女運動專號」的多篇專文，包括譯自日文作品，看似公允討論女權與母權兩種婦女運動主張，實則明示、暗示地偏袒愛倫凱的母性保護與母權主張，或援引她的作品作為論述準據。⁵³「婦女運動專號」頁數幾達平日《婦女雜誌》的兩倍，內容包羅萬象，實則充斥著主要作者群厚母權而薄女權、維持既有性別分工的男性本位思維。

《婦女雜誌》主編群強調「兩性共利」的婦女解放論述，除了展現在其宣揚母性的女權模式，也反映在他們對「第三

51 瑟廬，〈婦女運動的新傾向〉，《婦女雜誌》，卷9期1（1923年1月），頁2-7。

52 陳德徵，〈婦女運動的第一步——經濟獨立運動〉，《婦女雜誌》，卷9期1（1923年1月），頁12-16。

53 例見康國，〈婦女運動的成立及其要求〉，《婦女雜誌》，卷9期1（1923年1月），頁40-44；本間久雄著，尚一譯，〈橫在婦女運動根柢的兩種主張〉，《婦女雜誌》，卷9期1（1923年1月），頁45-49。

性」(The Third Sex)的反感與憂懼。「第三性」這個字眼，至遲已出現在沈雁冰 1920 年節譯愛倫凱〈愛情與結婚〉一文；她詮釋為某些女人因未能理解戀愛真諦與自身的性慾命運(sexual destiny)，而發展出的性格。⁵⁴ 在章錫琛、吳覺農與本間久雄等人提及「第三性」的文章中，則以「男性化的女子」、「不男不女」乃至「變態女性」來界定「第三性」，並無例外地徵引愛倫凱的學說作為論說依據。⁵⁵ 這些知識男性之所以憂心這個現象，在於這類女子破壞了長久以來建立在生理差異之上、鞏固男性社會優勢的性別分工模式。章錫琛等人尤其擔心「稍能自立的女子，都主張獨身，避免母性，祇追求一己的快樂與幸福，脫除一切的係累，而成所謂性與個人性衝突的時代」。⁵⁶ 吳覺農認同愛倫凱對於「第三性」女子在歐美社會因女權運動發達而增生的憂慮，並稱許她提議女性應像男性服兵役一般，接受義務的母職教育。⁵⁷ 這些批判「第三性」女子的言論，流露出《婦女雜誌》主要作者群不加掩飾的男性本位思維。他們的其他言論，諸如主張女子教育、男女共學，有條件地支持婦女就業與爭取參政權，或推廣節制生育等，都不超過女人應揚母性、盡母職的底

54 四珍，〈愛情與結婚〉，《婦女雜誌》，卷 6 期 3（1920 年 3 月），頁 1-12。

55 瑟廬，〈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觀與戀愛觀〉，《婦女雜誌》，卷 6 期 10（1920 年 10 月），頁 1-8；瑟廬，〈婦女運動的新傾向〉；本間久雄著，尚一譯，〈橫在婦女運動根柢的兩種主張〉；吳覺農，〈愛倫凱的母權運動論〉，三篇文章皆收入《婦女雜誌》，卷 9 期 1（1923 年 1 月）。

56 瑟廬，〈婦女運動的新傾向〉，《婦女雜誌》，卷 9 期 1（1923 年 1 月），頁 4。

57 吳覺農，〈愛倫凱的母權運動論〉，《婦女雜誌》，卷 9 期 1（1923 年 1 月），頁 74-79。

線。這些知識男性高度贊同的愛倫凱論點，完美切合他們對女性的既有認知與期許，也因而啓發他們愈見頻繁地援用愛倫凱的概念，來衍申強化自己的男性本位見解。

綜觀章錫琛在《婦女雜誌》企圖引導的言論，可發現這些男性菁英透過演繹愛倫凱的學說，不只將中國女人「性化」，更將其「母性化」，以「差異但平等」的邏輯，使她們無法擺脫家庭職責，並讓婦女解放無法與種族進化脫鉤，以便續保男性在社會上的既有優勢。白露(Tani Barlow)的研究，揭示「女性」這個詞彙及其本質，如何在1920年代受西方人道主義與性學理論啓迪，誕生於中國，並被男人女性主義者(male Chinese feminists)建構為中國男人的「他者」，頻繁地出現在報刊媒體中。⁵⁸ 白露指出，當時的中國女性主義論述，創造了作為「性化主體」(the sexed subject)的「女性」，此一觀點可證諸《婦女雜誌》援用愛倫凱思想所進行的女性論述。⁵⁹ 愛倫凱的作品，突出了女人作為性慾存在體的本質(their nature as sexual beings)，⁶⁰ 她由此申論戀愛結婚與自由離婚及二者所體現的新性道德，如何允許女人發揮女性及母性本能，使她們獲得意志自由與人格獨立，也藉由誕育優秀健全的兒女，貢獻社會與種族。愛倫凱的男性追隨者們，在《婦女雜誌》反覆演繹母性至上為婦女解放核心的女性主義言論，強調女子從爭取與男子相同的「人的自由」，到爭取她們獨特的「性的自由」所呈現的進化意義。⁶¹ 章錫

58 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3-54.

59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p. 64.

60 Ellen Key, *Love and Marriage*, p. 187.

61 原田實著，味辛譯，〈弗彌涅士姆概說〉，《婦女雜誌》，卷8期5

琛所謂「用戀愛來解決婦女問題」，或者《婦女雜誌》在他掌舵時高唱戀愛神聖說，都是以愛倫凱母性尊重與「生殖的神聖」的主張為基礎。⁶²

1925年1月，章錫琛在《婦女雜誌》推出「新性道德號」，這個專號立基於愛倫凱學說，同時又超越之，可謂該誌對愛倫凱又一文化轉譯的表現；然而該專號推出的後果，竟是他與周建人離開商務，另創《新女性》月刊。基本上，愛倫凱對新性道德的闡釋，較強調積極的且兼具利己與愛他兩層次的道德；她堅持無戀愛的結婚為不道德，而極力主張戀愛結婚。但章錫琛將之延伸擴張，除了闡述愛倫凱思想中「母性至上」與（異性）「戀愛道德」的新性道德理念，更在〈新性道德是什麼〉文中，擴大納入他視為消極道德的範疇：「如果經過兩配偶者的許可，有了一種帶著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質的不貞操形式，祇要不損害於社會及其他個人，也不能認為不道德的。」⁶³ 周建人撰文附和：「至於說同時不妨戀愛二人以上的見解，以為只要是本人自己的意志如此而不損害他人時，決不發生道德問題的（女子戀愛多人也是如此）。」⁶⁴ 章、周在此表達「有條件的不貞操不應被視為不道德」的新性道德觀，與愛倫凱的戀愛貞操論和一夫一妻的主張，已存在相當距離。上述這兩段話，一來逸出《婦女雜誌》先前基於愛

（1922年5月），頁64-71。

- 62 章錫琛，〈通信：戀愛問題的討論〉，《婦女雜誌》，卷8期8（1922年8月），頁121-123。
- 63 章錫琛，〈新性道德是什麼〉，《婦女雜誌》，卷11期1（1925年1月），頁2-7。
- 64 建人，〈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婦女雜誌》，卷11期1（1925年1月），頁8-12。

倫凱思想對貞操的界說，二來引發北大教授陳百年(1886-1983)的批評，演變成跨雜誌的意識形態論爭，導致章、周兩人最終辭職離開商務印書館。⁶⁵

愛倫凱的學說思想，並不因章錫琛 1925 年 8 月卸下主編職務後，便在《婦女雜誌》消失，更未如幾位大陸學者所言，1920 年代之後即在中國銷聲匿跡。趙雅研曾謂「五四退潮後，我們很難從書籍中覓得愛倫·凱的身影」，事實上，眾多史料說明，「全盛期」過後，不少中國作者持續介紹、回應或援用愛倫凱的思想，直到 1947 年仍有論者專文介紹，⁶⁶ 她的生平與學說，也出現在不少名人傳記與專書中。⁶⁷ 這些不同類型的史料，可有力地反駁趙雅研上述說法。本文後半將陸續說明，不同於全盛期時較集中闡釋代表字詞與概念，此後愛倫凱思想的傳播方式，更多展現在論者對其概念的在地化衍譯、選擇性應用與批判性回應。

譯介全盛期之後的愛倫凱學說在中國的發展，有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在社會論述專文中，介紹或提及愛倫

65 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29-92。

66 趙雅研，〈「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頁 39。

67 例見金克蘭，〈談愛倫凱女士的婦女運動〉，《中央日報婦女週刊》，期 59（1947 年 7 月 31 日），第 9 版。郭真，《戀愛論 ABC》（上海：ABC 叢書社，1929）；郭真，《結婚論 ABC》（上海：ABC 叢書社，1929）；沈君默，《現代女性》（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2）；金仲華，《婦女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麥惠庭，《中國家庭改造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沈茲九編，《世界女名人列傳》（上海：中華書局，1936）；徐國定，《現代女名人傳》（上海：大東書局，1946）。

凱的女性作者人數攀升。自從愛倫凱之名及學說受國人關注後，譯介者幾乎皆為男性知識菁英；以非小說的論說文類回應愛倫凱思想的中國女性作者，實如鳳毛麟角。黃肅儀發表於 1922 年 7 月的〈戀愛結婚之真義〉，註明該文寄自日本女子大學，此文當屬五四階段認同愛倫凱思想的中國知識女性論述之一。黃肅儀在文中引述愛倫凱關於戀愛結婚的幾句名言，闡釋兩性出於性與人格覺醒而自由結合的戀愛，並在婚姻中創造生命，對個人與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⁶⁸ 琴如女士在 1926 年秋的《婦女雜誌》，發表〈愛倫凱的思想及其晚年〉；倪淑榮女士所譯述的〈介紹愛倫凱(Ellen Key)的愛與結婚的理想〉，則刊載於同年 10 月的《晨報副刊·家庭》。⁶⁹ 1930 年代之後，幾位較知名的女性知識菁英，也為文論及愛倫凱，包括曾在《婦女共鳴》等發表作品的金石音與陳碧蘭，多次為《女子月刊》撰文的孫嵐，以及曾任中國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沈慧蓮等。⁷⁰

其次，從 1920 年代後期到 1940 年代中期，母性論可謂中國男女作家譯介或評述愛倫凱著作最常見的主題。楊聯芬

68 黃肅儀女士，〈戀愛結婚之真義〉，《婦女雜誌》，卷 8 期 7（1922 年 7 月），頁 24-27。

69 琴如女士，〈愛倫凱的思想及其晚年〉，《婦女雜誌》，卷 12 期 9（1926 年 9 月），頁 36-38；倪淑榮女士譯述，〈介紹愛倫凱(Ellen Key)的愛與結婚的理想〉，《晨報副刊·家庭》，期 51（1926 年 10 月 24 日），頁 14-15。

70 陳碧雲，〈論婦女職業與愛倫凱的母性復興〉，《女青年月刊》，卷 12 期 9（1933 年 11 月），頁 1-7；孫嵐，〈反戀愛論〉，《女子月刊》，卷 4 期 5（1936 年 5 月），頁 12-17；孫嵐，〈戀愛之認識〉，《女子月刊》，卷 5 期 6（1937 年 6 月），頁 20-23；沈慧蓮，〈童嬰保護問題及其解決辦法〉，《教育通訊（漢口）》，卷 6 期 11（1943 年 4 月），頁 10-11；金克蘭，〈談愛倫凱女士的婦女運動〉，《中央日報婦女週刊》，期 59（1947 年 7 月 31 日），第 9 版。

指出五四新文壇「選擇了她（愛倫凱）的『戀愛論』，而放棄了她的『母性論』」；此一觀點，也許只基於「超賢妻良母人生觀」的主張、或左翼「革命加戀愛」的小說而發。⁷¹ 事實上，女作家冰心(1900-1999)在 1920 年代的小說，便充分展現類似愛倫凱著述中歌頌母愛與關愛兒童的情懷。⁷² 我們若將考察的史料擴及社會論述，將發現論者涉及愛倫凱闡述戀愛、婚制改革、兒童保護、教育、新性道德、婦女運動與新婦女等主題時，也經常提及她的母性說。林板橋 1926 年在《民鐸》雜誌發表的〈愛倫凱教育學說之介紹：代悼愛倫凱女士〉，以類似章錫琛等人的論述模式，將婦女運動的發展詮釋為從初期爭取人的解放，到後期「母性擁護運動，就是凱女士所竭力唱道的」。⁷³ 上述琴如女士與倪淑榮女士的同年著作中，都肯定愛倫凱的母性論。1931 年，上海《民國日報》刊載散文家孫福熙(1898-1962)以筆名「明齋」所撰的〈關於愛倫凱女士〉，文中介紹愛倫凱的戀愛結婚之外，更大讚她的母性論，稱其「誠然是賢母良妻的好主張」。⁷⁴ 值得指出的是，當「母性中心主義」作為新詞關鍵字，1932 年出現在《中華周報》時，其詮釋即以愛倫凱思想為宗：「母性中心主義：以發達母性為女子教育之主旨之主義，西人有女子之母性始於搖籃之諺，即其根據也。瑞典女教育家 Ellen

71 楊聯芬，《浪漫的中國——性別主義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頁 305。

72 趙雅研，〈「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頁 35-36。

73 林板橋，〈愛倫凱教育學說之介紹：代悼愛倫凱女士〉，《民鐸》，卷 7 期 5（1926 年 5 月），頁 1-9。

74 明齋，〈關於愛倫凱女士〉，《民國日報》（上海），1931 年 5 月 23 日，第 3 張，第 2 版。

Key 所力倡者。」⁷⁵ 此一將詞源明確歸於愛倫凱的中文「新詞詮」，顯示她的母性論在中國已被公認。尤有甚者，愛倫凱的學說還出現在 1941 年教育總署編審會出版的《高中女子修身》教科書關於「母性」的課文中，足見其母性思想受到中國教育界某種程度的重視。⁷⁶

中國譯介愛倫凱的全盛期過後，出現的第三個重要現象，是點名批評其學說的聲浪湧現。從愛倫凱之名進入中國，到章錫琛主導時的《婦女雜誌》，絕大多數有關她的論述皆屬讚譽，鮮少批判。惟此後在報刊與專書論及愛倫凱的中國作者們，開始出現有條件地認同、乃至批駁其學說的傾向。這些作者男女皆有，批評焦點涵括愛倫凱的戀愛論、母性說、婦女職業觀與兒童教育思想等。這些著述呈現愛倫凱學說在中國的異質化詮釋，也反映中國論者對外來思潮接受的多元化。本文後兩節，將分別析論愛倫凱學說在中國社會論述的再現與質變，以檢視中國論者對此外來思想的階段性回應。

三、愛倫凱思想的本土化

愛倫凱思想經章錫琛領銜的《婦女雜誌》強勢推銷五年，其代表字詞與主要概念在該誌提供的語境中，獲得充分發展。此後，在北伐、國民黨訓政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持續

75 〈新詞詮：母性中心主義〉，《中華周報》，期 50（1932 年 10 月 15 日），頁 1235。

76 教育總署編審會著，《高中女子修身（第三冊）》（北京：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41），頁 55-60。

有男女作者們選擇以愛倫凱作為對話對象，來開展自己對婚戀、新性道德、婦女職業等問題的論述。過去集中討論 1920 年代文藝作品的幾位大陸學者，將宣揚婚戀自由的小說或戲劇創作，都歸功於愛倫凱的啓迪，並視之為愛倫凱學說在中國被接受的證明。⁷⁷ 此種說法可能滋生問題，一是忽略同時期主張婚戀自由的外國思想家貢獻，如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加本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蕭伯納(Bernard Shaw, 1856-1950)與廚川白村等，讓愛倫凱獨佔功勞，二是這些學者宣稱受愛倫凱影響的小說史料，鮮少真正提及她。這般姑且名之為「精神演繹」的判準法則，若未切實根據史料，過度發揮，易生牽強附會之嫌。然若妥善援引文獻，或不失為評估外來思想如何影響中國的研究方法之一。本節將探查某些衍申性回應愛倫凱思想的社會論述，以了解愛倫凱思想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並深入評析其在中國產生的影響與進程。

所謂「本土化」，是「顯示各種異質多樣性和特定情境要素的過程」。⁷⁸ 在此，我用「本土化」論述來指涉中國作者基於文化、政治、經濟等國情，以及個人或他人經驗與自身思維，而在接受愛倫凱思想的過程中，產生的創造性與批判性回應。當某一外國思想家的學說已廣為人知或被普遍接受之後，才會逐漸出現不引其名、逕行發揮的本土化論述。換言之，1920 年代愛倫凱之名頻繁現身中國進步報刊，1930

77 例見張鵬燕，〈愛倫凱與中國現代文壇〉，《新文學史料》，期 1（2013 年），頁 159-168。

78 〈在地化〉，MBA 智庫百科，<https://wiki.mbalib.com/zh-tw/%E5%9C%A8%E5%9C%B0%E5%8C%96>（擷取日期：2021 年 8 月 14 日）。

年代之後不再為人熱切傳誦，並不表示她的思想影響力就此消失。本節所舉之例，即為作者置身中國與其個人情境中，回應愛倫凱思想並提出各具見地的本土性論述。

整體觀之，五四之後，在中國的社會脈絡與文化傳統中，回應愛倫凱思想而發展出本土性論述的作者，主要來自兩大陣營：主張（國民、階級或社會）革命者，與對戀愛實踐諸弊端的批判者。愛倫凱的戀愛神聖論，在廣受中國知識菁英提倡並陶染青年男女的同時，逐漸受到上述兩種勢力的交相挑戰；但其支持者，並非全盤否定愛倫凱的學說，反而有不少人企圖融合中國現實與西方理論。東南大學法科畢業、後任職國民黨政府的洪瑞釗(1906-1996)，曾於 1928 年以國民黨贊助出版的《革命與戀愛》，與愛倫凱思想對話，並發展出他的修正性本土論述。該書可謂北伐期間各地陸續出現的「革命與戀愛」論戰中，代表國民黨革命戀愛觀的專著。⁷⁹ 洪瑞釗在申論革命者應如何認知與解決戀愛問題的過程中，從強調國家大我的利他主義與救濟社會叢生的戀愛流弊兩個角度出發，對愛倫凱的戀愛神聖／自由觀，做了因應國情的調整。洪瑞釗先說明他不否認戀愛自由本身的價值，並表示自己「深信貞操是戀愛所必不可少的原素，跟著真正的『靈肉一致』而來的」，⁸⁰ 但他卻認為愛倫凱所提倡的，基於雙方絕對信心與誠意而生的戀愛自由，以及婚姻離合僅「以戀愛之有無為從違」的主張，讓戀愛凌駕道德法律束縛

79 呂芳上，〈1920 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 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73-102。

80 洪瑞釗，《革命與戀愛》（上海：民智書局，1928 年 11 月再版），頁 69。

等一切價值，實陳義過高，在「中國目前的情勢之下」，將產生諸多流弊。⁸¹ 他更反對愛倫凱的自由離婚思想，因為在中國，許多男子逕行離異髮妻，因為釀成許多無辜受害者。不過，在該處結尾部分，洪瑞釗仍引用愛倫凱在《戀愛與結婚》的觀點「情意真摯、意志堅定的健全男女「追求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的純粹慾望，是合理的正當的」，歸結道：「這種場合，愛倫凱能給我們以關於戀愛與結婚的條件的極明確的概念，願青年男女同志都能信受奉行，纔好。」⁸² 另一方面，洪氏在該書附錄〈革命婦女的戀愛問題〉一文中，某種程度上也唱和愛倫凱的母性論。⁸³

洪瑞釗透過《革命與戀愛》，示範了北伐時期中體西用式的愛倫凱本土化論述。他一面肯定愛倫凱學說的價值，一面依據自身國民革命的意識形態、既有兩性與文化道德觀、以及審度弊端叢生的戀愛行爲，有條件地接受愛倫凱思想。這種較為務實的評判，不同於譯介全盛期眾多追隨者一味的擁護宣揚，反映出愛倫凱學說的在地演進。此類本土化論述，也可見洪鈞刊載於章錫琛主編的《新女性》月刊(1926-1929)的作品中。在 1928 與 1929 兩年間，章錫琛針對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非戀愛論」而發起相關論戰（詳見下節所述），以及 1928 年 12 月針對柯倫泰小說的徵文討論，洪皆曾參與，還撰有數篇闡述自身戀愛觀的專文。愛倫凱之名雖未出現於洪鈞之文，他的論述顯然認同愛倫凱式的戀愛觀，但欲進行調整，使之更適合落實於中國。

81 洪瑞釗，《革命與戀愛》，頁 19-21。

82 洪瑞釗，《革命與戀愛》，頁 64。

83 洪瑞釗，《革命與戀愛》，頁 88。

無論洪鈞對抗無政府主義者的「非戀愛論」，或批判柯倫泰提出的「戀愛遊戲」與性交自由論，乃至於針砭國人實踐戀愛，都呈現出他仍主張愛倫凱式的戀愛觀，但欲進行調整、使之更適合在中國落實。1920年代下半期，愛倫凱的戀愛自由論在中國受到兩種外來思潮的挑戰；一為美國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主張的自由戀愛論，二為俄國馬克思女性主義者柯倫泰主張的性交自由論。章錫琛曾掀起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熱潮，他在《新女性》繼續為她提倡的戀愛自由代言，應付異質性的思想挑戰。但正如前述，章錫琛對愛倫凱思想進行過多種文化轉譯，並非照本宣科。1928年秋，章氏藉由柯倫泰的小說《三代的戀愛》，並結合兩位日本作家評述該小說的作品，進行一場讀者徵文討論，他定名為「新戀愛問題」，以觀察當時中國社會「關於戀愛思想的轉變的情形」。⁸⁴ 洪鈞稍早與「非戀愛論者」筆戰時，發揮了愛倫凱式「靈肉一致」的論調，逐一反駁對手的論點，包括戀愛只有肉慾、兩性結合只有性交、戀愛反社會且只是有閒階級的專利品等。在「新戀愛問題」的徵文中，洪鈞針對柯倫泰在《三代的戀愛》中敘述的不合理處，指出女主角蓋尼亞雖宣稱與母親的愛人廖勃柯夫之間只有性而無愛，然她對廖勃柯夫有懸念，而且二人精神親密、人格互尊，已符合被她否認的「戀愛」關係。洪鈞最後總結，「不論其為『性交自由』，或『戀愛遊戲』，不論其

84 編者，〈新戀愛問題——徵求解答——〉，《新女性》，卷3期9（1928年9月），頁986。關於《新女性》的非戀愛論戰、與「新戀愛問題」的相關討論，見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6（2008年12月），頁29-92。

否認戀愛，或承認而加以理智的抑制，這些都是抹殺感情，而違反自然律的。」⁸⁵

1929 年初，洪鈞透過〈冒險的戀愛觀〉與〈弱者的戀愛〉二文，嘗試在愛倫凱式的戀愛神聖論與眾反對者之間，提出折衷協調之道，讓「戀愛」能更簡單地被實踐。當時許多中國論者，例如前述的洪瑞釗，為救濟時下頻傳的戀愛弊端，提出各種條件與箴言，以警惕眾人更小心審慎地談情說愛。洪鈞卻認為，中國的戀愛問題，主要出在「戀愛至上論者」把戀愛詮釋得太神聖且虛無飄渺，反而讓青年男女無所適從。他甚且認為許多知青受這類言論左右，相信真正的愛情會自然滋長，不應積極營求，只需被動等待，以致普遍「陷在不得戀的苦悶中」。⁸⁶

洪鈞對中國青年男女實踐戀愛的建言，可謂將愛倫凱的戀愛論生活化，使戀愛更可能實踐的本土性論述。洪鈞建議對戀愛「去神聖／神秘化」，亦即承認「戀愛的初步是肉的，由肉的互愛而發生精神上的互愛時，便算達到了戀愛的境界」。依他所見，「真戀愛」必須在同居這般共同生活的環境中培養與促成，而非徒具形式地寫情書，或不切實際地坐等兩心相許。⁸⁷ 1920 年代末，時值「戀愛」受社會各界監督，輿論抨擊其流弊，洪鈞反其道而行，強調戀愛不唱高調、從做中學的重要性。他的「同居」主張，是希望把被神聖化

85 洪鈞，〈六：「自由性交」與「戀愛遊戲」〉，《新女性》，卷 3 期 12（1928 年 12 月），頁 1379-1383。

86 洪鈞，〈弱者的戀愛〉，《新女性》，卷 4 期 2（1929 年 2 月），頁 224-229。

87 洪鈞，〈冒險的戀愛觀〉，《新女性》，卷 4 期 1（1929 年 1 月），頁 67-68。

的戀愛理想，能平凡化為務實的日常踐行，可謂發揮愛倫凱的戀愛理念，將其生活化的本土論述例證。

像洪鈞這樣，未提愛倫凱之名、只論其說的思想接納與回應過程，持續出現在國民黨訓政階段(1928-1937)，其時戀愛已廣為社會大眾接受或實踐，復興母性也伴隨新生活運動而起。1933年，上海《生活》週刊(1925-1933)以發抒市民心聲廣受歡迎，更因周建人的一篇〈戀愛與貞操〉，在該刊信箱欄引發長達四月餘、被主編鄒韜奮稱為「空前未有的大筆戰」。該論戰廣受矚目，生活書店因此在該年底迅速將相關文章集結成專書出版。點燃戰火的周建人及反擊者的言論，既在不同程度上有著愛倫凱思想的印記，也多少有所調整。曾在1920年代陪同章錫琛經歷數次大小論戰的周建人，或許未料到1933年自己會成為眾矢之的。簡單歸結周建人〈戀愛與貞操〉的重點，主要有二：戀愛即「兩方的慾望趨向一致」；貞操無論如何說法、處何時代，其本質「是對於女性的一種約束，並非起於戀愛的本性」。⁸⁸ 周建人這些見解，與他在上個年代呼應章錫琛等人「靈肉一致」及「戀愛貞操」等愛倫凱式概念，實不可同日而語。相對地，那些受到周文刺激，紛紛致信《生活》週刊、或受主編之邀加入筆戰的論者們，絕大多數都在靈肉一致及婚戀自由等代表愛倫凱思想的概念基礎上，發揮其論點。這些來信者，不論男女，都對周建人的「戀愛唯性慾論」（借用論者秀戈的字眼）相當反感，並強調「戀愛」絕非僅肉慾，還應有人格的結合或思想感情行為相近等條件。針對貞操，男女參戰者多不約而同強

88 克士，〈戀愛與貞操〉，收入生活書店編譯所，《戀愛與貞操》（上海：生活書店，1933），頁1-6。

調其為戀愛表現的核心，亦即仍與愛倫凱的概念合拍。⁸⁹ 綜觀「戀愛與貞操」論戰的各家意見，即使過去宣揚戀愛貞操轉而批評貞操價值的周建人，都未挑戰愛倫凱所闡述的戀愛自由。

正因戀愛的實踐在 1930 年代較之前普及，卻仍弊端叢生，以致當時回應愛倫凱戀愛論的本土性論述，雖認同她的戀愛理念，卻批判或反對戀愛在中國的實際發展。1936 年，曾在《女子月刊》發表數篇專文的女作家孫嵐，以〈反戀愛論〉一文評述愛倫凱的戀愛思想，並提出她自己的見解。理論上，孫嵐以愛倫凱式的筆調，申明戀愛是「自我的誕生」後的「心心相印」，是一種「互相完成自己，而互相親愛的狀態」，「靈肉一致的愛，是兩性結合的最高典型」。⁹⁰ 但她接著以更多篇幅，論述當下的中國現狀如何無法孕育真戀愛。一方面，她批評時人多「因著盲目的熱情地衝動而產生的一種受過社會大紅爐的鎔煉的『假自我』的『慾』」，並且不負責任地提倡自由離婚，來遮掩出於各種利己目的的「準戀愛」（非真戀愛）之弊。⁹¹ 另一方面，她指出現實社會的戀愛，仍存在著性與經濟的榨取，因此「所謂現在的『戀愛』，在實際上只是一種『慾』，而這個慾又必然是資本主義下的男性的慾」。孫嵐強調，真正的戀愛，唯有在男女的「經濟與性的關係完全在平等的狀態下」，使人格與意志得

89 例見趙季芬，〈我對戀愛和貞操的意見〉；錢阜虞，〈不是無意義的壓迫〉，收入《戀愛與貞操》，頁 31-35, 42-47。

90 孫嵐，〈反戀愛論〉，《女子月刊》，卷 4 期 5（1936 年 5 月），頁 12-17。

91 孫嵐，〈戀愛之認識〉，《女子月刊》，卷 5 期 6（1937 年 6 月），頁 20-23。

以完整發展，才可能實現。她基於這些論點，總結道：「否定現在『戀愛』的存在，才能發生真實的自我的戀愛。」⁹² 由上可知，孫嵐並未否定愛倫凱的靈肉一致戀愛觀，而是認定現行社會的「性—經濟體制」扼殺真戀愛的發展，所以她才「反戀愛」。

愛倫凱譯介全盛期之後，除有論者因時制宜地轉譯愛倫凱的戀愛思想，也有人發揮她的母性論來闡述女性解放，陳衡哲(1890-1976)即為一著例。陳衡哲與胡適同為清華公費留美生，坐擁許多中國「第一」的頭銜，如第一位女教授、寫出第一篇白話小說等，是名符其實的「一代才女」。這位才女婚後曾為了克盡母職，數次中斷其大學教職。她早在 1920 年所寫的〈波兒〉，或於 1926 年發表〈一隻扣針的故事〉二部小說中，都充分表露肯定母職與讚頌母愛的情感，後代學者多將陳衡哲這些言行表現歸諸受愛倫凱思想的影響。⁹³ 陳衡哲在中式家風與西式教育的薰陶下，針對中國社會情勢與婦女問題，提出「事業家庭兼顧的新女性主義」。⁹⁴ 她曾多次撰文，闡釋女性應努力平衡發展「個性」與「母性」此種「雙重人格」的見解。⁹⁵ 有別於章錫琛等男性本位的母性主義，陳衡哲的理論激勵中國女性追求自身理想與家庭外的

92 孫嵐，〈反戀愛論〉，《女子月刊》，卷 4 期 5，頁 12-17。

93 例見睦淺子、羅宣，〈陳衡哲的母職觀及其中西文化溯源〉，《文史博覽（理論）》，2009 年期 8（2009 年 8 月），頁 25-29；趙雅研，〈「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頁 36-38。

94 黃嫣梨，〈中國近代史上的革新婦女——陳衡哲的女性意識〉，《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0 期 4（2004 年 7 月），頁 1-3。

95 陳衡哲，〈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獨立評論》，期 159（1935 年 7 月），頁 2-6；陳衡哲，〈婦女問題隨筆〉，《宇宙風》，期 68（1938 年 5 月），頁 65-66。

事業。但另一方面，她對母性及母職的看法，與愛倫凱形異而實無分軒輊。整體而言，她倆共同認定發展人格 (personality) 是女性解放的基本，但愛倫凱申論女人可以透過「母性」來展現個性並貢獻社會，陳衡哲則表示女人在表現母性之際，也需同等發揮個性，才能開展健全人格。話雖如此，陳衡哲的女性主義，在理論上確實堅持女人的母性與個性並重，但當二者出現衝突時，在實踐上仍傾向已婚婦女應優先盡好母職，確保子女健全發展。⁹⁶ 在陳衡哲身處的中國社會，女性仍須面對愛倫凱當年指出的「最緊要的衝突」(the most momentous conflict)，即必須在心靈生活（指職業）與家庭生活中擇一。⁹⁷ 陳衡哲與愛倫凱皆理所當然地視「教養（自己的）小孩」為母職重點，不贊同兒童公育。她不同於愛倫凱的，是她嘗試為身兼經濟工作與家庭責任「兩重職業」的已婚職業女性，闖出一條可行之道。

洪瑞釗、洪鈞、「戀愛與貞操」的論戰者、孫嵐與陳衡哲等人，共同參與也見證民國社會吸納與轉化愛倫凱思想的歷史進程。美國華裔學者李海燕，曾申論 1930-40 年代中國文學文本中的愛情，從前兩個年代的「超善」(hypergood)，轉變成「日常善」(lifegood)；臺灣史家柯惠鈴，也指出愛情在 1930 年代中國社會有「庸俗化」或商品化的傾向。⁹⁸ 本

96 陳衡哲，〈婦女與職業（婦女問題之一）〉，《現代評論》，第二周年紀念增刊（1927年1月），頁60-73。

97 Ellen Key, *Love and Marriage*, p. 216。本文此處接用朱舜琴的譯文，見愛倫凱著，朱舜琴譯，《戀愛與結婚》（上海：光明書局，第二版，1926），頁163-164。

98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7；柯惠鈴，《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新北市：臺灣

節對幾起不同個案的考察，大致呼應此二學者的觀點，並企圖凸顯五四之後中國接受與反芻戀愛思想的異質性與在地化論述發展。五四時期受愛倫凱學說啓發的神聖、崇高與至上的戀愛論述，自 1920 年代後期以降，的確漸呈務實、世俗與生活化等性質。但這不表示戀愛至上／神聖論被完全摒棄，也不意味著 1930 到 40 年代的戀愛論述朝單一方向發展。不同於五四那些只重高揚戀愛理念的著述，孫嵐反對既有戀愛實踐的言論，在堅持愛倫凱式的戀愛理想之餘，明確展現了務實評估社會現狀與兩性關係的特質。大體上，當「戀愛」從紙上談兵的理想，成為身體力行的實踐後，難免出現平凡化的傾向。1941 年中還有論者頗有怨言地指出：「近來一般年輕的學生們，大部分都在主張著戀愛至上論，不是在課堂上寫情書，便是在大街上，追女學生，大好的光陰都消耗在無聊的事情上。」⁹⁹ 章錫琛等人筆下的「戀愛至上」理想，與抗日期間青年學子所踐行的「戀愛至上論」，難以相提並論。繼續撰文闡述戀愛的論者，雖共同置身中國從訓政到抗戰的大環境，卻因個人經驗、意識形態與社會觀察等變數，而有不同的體悟與重點發揮。洪瑞釗於北伐期間召喚青年在革命大業與戀愛小我之間，均衡發展；洪鈞透過社會觀察，呼籲戀愛重在起而行，非只坐而言（或空想）。周建人參與形塑戀愛神聖說近十年後，對戀愛與貞操本質的見解，都起了變化。而透過筆戰表達異議的論者們，雖從各自立場出發，卻多少堅持戀愛的靈肉一致性，以及平等相互的貞操

商務印書館，2019），頁 386-424。

99 不化，〈戀愛神聖！神在那裏？聖在何處？〉，《吾友》，卷 1 期 72（1941 年 8 月），頁 20。

對戀愛的重要性。

愛倫凱的婚戀自由與新性道德思想，透過這些具有異質性、卻大致呈現「神聖不再」的戀愛論述，持續在中國紮根、衍化。1944年，雷萌在上海出版的《戀愛手冊》一書，活脫是個依愛倫凱學說而發揮的戀愛行為攻略。該書只在一、兩處提及愛倫凱之名，但在介紹各家戀愛定義之後，明確宣稱「我們要主張靈肉一致的戀愛」。¹⁰⁰ 這些論者對戀愛抱持的務實心態，與不唱高調的建言，不盡然是庸俗的表現，而是讓戀愛真正成為日常的生活與道德實踐。至於陳衡哲的女性主義與母職論見，則在呼應愛倫凱學說的前提下，提議透過教育與職業訓練等途徑，讓善盡母職的女性也可能發揮其他才能，以實踐自我。¹⁰¹

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本土化表現，除了本節所舉證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愛倫凱味」的著述外，還有另一類點名批判的言論，更精彩地展示出中國男女知識菁英的反思性與創造力。本文最後一節，將轉向這群中國的愛倫凱挑戰者，觀察其如何藉由批判性對話，闡述自己的論見。

四、挑戰愛倫凱

自從愛倫凱學說進入中國的社會論述之後，挑戰其思想、並提出不同見解的中國作者，並非保守衛道者，而是接受新式教育、思想前衛的男女知識菁英。這些大致在 1920

100 雷萌，《戀愛手冊》（上海：經緯書局，1944），頁 56-69。

101 陳衡哲，〈婦女與職業（婦女問題之一）〉，《現代評論》，第二周年紀念增刊（1927年1月），頁 60-73。

年代中期後出現的論者，身處中國社會而浸淫於眾外國學說影響的跨文化脈絡中，透過回應愛倫凱的觀點，向中國讀者表達其改造兩性關係或社會的論見。她／他們主要將矛頭指向愛倫凱基於性別本質主義與資本主義社經結構而發的母性論、戀愛觀與新性道德思想。本節將論證，這些質疑與修正愛倫凱學說的言論，展現中國新文化多元女性主義的思想光譜。

無政府主義者張履謙，在批判愛倫凱的戀愛道德觀之前提下，發展出落實個人自由性慾與宣揚人類愛的「非戀愛論」。他以「謙弟」的筆名，先後在張競生主編的《新文化》與章錫琛的《新女性》中，與主編們唱反調。張履謙的「非戀愛論」，陸續獲得毛一波與盧劍波等同志的唱和，並在《新女性》二度引發非戀愛與戀愛陣營的論戰。¹⁰² 張履謙並不否認愛的偉大與價值，卻反對被愛倫凱等思想家詮釋為兩性結合與愛慕表現的「戀愛」。他強調，男女的性關係是生理本能，與戀愛無關，亦不應受戀愛束縛。男女間思想交流、互相關懷展現的感情，無異於友愛、親情或人類愛，不宜特別例外地標以「戀愛」，更不應與兩性性吸引或性關係混淆。張履謙尤其批評愛倫凱推崇的戀愛道德——他名之為「戀愛貞操新論」，他認為男女的性結合及關係的維持，無關乎貞操。¹⁰³

102 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6（2008年12月），頁29-92。

103 謙弟，〈論「戀愛論」〉，《新文化》，卷1期3（1927年3月），頁95-108；謙弟，〈戀愛貞操新論〉，《新女性》，卷2期5（1927年5月），頁525-531；謙弟，〈非戀愛與戀愛〉，《新女性》，卷3期5（1928年5月），頁501-525。

張履謙從反對愛倫凱思想而發揮的「非戀愛論」，展現男性本位的無政府女性主義思維：主張打破所有造成權力階序的制度與觀念，不論婚姻、貞操、家庭或政府。稱之為「男性本位」，乃因張履謙等主張非戀愛論的男性無政府主義者仍在男性主導的社會革命架構下，談論婦女解放，且未慮及懷孕、生育、墮胎等女性獨有的問題。¹⁰⁴

李君毅於 1931 年發表在《婦女雜誌》的〈從愛倫凱到柯倫泰〉，則反映國共分裂後共產主義者與左翼文人的立場，也呼應著革命文學從「為戀愛而革命」到「為革命棄戀愛」的演變。¹⁰⁵ 李君毅是貴州人，曾加入 1921 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從〈從愛倫凱到柯倫泰〉的內容，不難窺知他認同共產主義者主張的社會革命。李文以愛倫凱與柯倫泰來「象徵兩個時代的婦女模型」，前者是處於「資本主義向上發展」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後者則為置身「階級衝突劇烈」的俄國大革命時期的「現實主義者」。李君毅從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發，強調彰顯個人自由的戀愛不應凌駕造福集體的革命，明確表現捨愛倫凱而就柯倫泰的立場。對他而言，愛倫凱的戀愛觀與母性論，都象徵資本社會個人主義式的婦女解放訴求，已然過時；柯倫泰小說中的女主角，則預示著中國社會經歷革命後的未來婦女解放前景。「戀愛」在李君毅看來，似乎不復以往棘手：「現在的青年男女，不像

104 許慧琦，〈愛與慾的辯證——從愛瑪·高德曼在中國的譯介談北伐前後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愛論述〉，《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18（2020 年 6 月），頁 269-318。

105 徐仲佳、張光芒，〈欲望與理性悖論的調適——論中國現代文學的「革命+戀愛」思潮〉，《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期 2（2005 年），頁 27-32。

他們的前輩對於婚姻或戀愛問題會有許多糾紛。」¹⁰⁶ 此一見解，證諸 1930 年代的新聞報導與時人論述，似乎過度樂觀而不切實際。他召喚女性與男性並肩進行社會革命的馬克思婦女解放論調，看似以兒童公育與公共廚房等方式解放女性的家務勞動，然仍未改變男性在勞動市場的優勢與家庭中父權地位。這樣的論調，並未脫離男性本位的思維。

相對地，某些挑戰愛倫凱思想的女作家，所展現的是我稱之為「女性本位的女性主義思維」：亦即，在兩性平等的理論與現實基礎上，凸顯女性獨特困境與訴求，批判既有兩性分工觀所蘊含男性中心與男優女劣的社會意識，並倡議女性自由與適（個）性發展的論述。在發揮愛倫凱思想的相關言論中，有些女性作者認同社會既定的性別觀與兩性分工原則，以致表達的論點仍屬「男性本位的女性主義」思維。至於具有「女性本位意識的女性主義」思想，則不見諸菁英男性的著作，而為知識女性所包辦。以下討論的數件個案，擬呈現中國女性菁英透過評析愛倫凱（式的）思想，發展出重點有別、論點各異的女性本位女性主義。

在《婦女雜誌》傾力宣揚愛倫凱思想的階段，蔣鳳子可說是唯一在該誌表達異議，並因此受章錫琛等知識男性糾正的女性作者。1922 年 8 月，《婦女雜誌》刊出三篇蔣鳳子的〈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一～三）〉；第四篇〈答客問〉，出現於翌年 2 月。蔣鳳子在文中衍申出幾個挑戰愛倫凱概念的論點，引人側目：戀愛自由反對婚姻結合；戀愛自由是「一方面贊成戀愛，同時於他方贊成獨身」；「『戀愛自由』

106 見李君毅，〈從愛倫凱到柯倫泰〉，《婦女雜誌》，卷 17 期 7（1931 年 7 月），頁 136。

的自由是積極的，是『我要做什麼人就可以做什麼人，人是不專為戀愛而生存』的自由。」¹⁰⁷ 她透過對「戀愛自由」的新解，及由此發揮的廢婚制、倡獨身等論點，表達女性本位的無政府女性主義思維，明顯牴觸愛倫凱與其中國追隨者的信念。¹⁰⁸ 對此，吳覺農首先撰文發難，援引愛倫凱之說反駁蔣鳳子。吳氏聲明「戀愛就是人生」，「人是必須為戀愛而生存的」，並重申人類有「種族保存與個性保存的本能」此一「學術界的定論」，以此凸顯「『獨身與戀愛是截然的兩件事』，不能混同的」。¹⁰⁹ 章錫琛接力發文，強調以愛倫凱為宗而界定的「戀愛自由」概念，既不主張廢除婚制、更不包含獨身，已為眾人公認，不宜恣意改變。¹¹⁰ 蔣鳳子這番標新立異的「雜音」，在力捧愛倫凱學說的《婦女雜誌》中驚鴻一瞥，但也在章錫琛的指揮下迅速銷聲匿跡。

1930 年代人數漸增的知識女性，面對西方復興母性風潮東傳、國內復興傳統運動方興未艾、商業消費主義物化女性更甚於前等不利女權發展的阻力，積極反抗愛倫凱學說等各種限制女性發展空間的言論。自五四以降，女子高等教育與新文化的發展，不僅擴展女性的視野，強化其批判性思考與據理陳述的能力，對男性言論不再亦步亦趨的女性本位意識

107 鳳子，〈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一～第三〉，《婦女雜誌》，卷 8 期 8（1922 年 8 月），頁 17-19。

108 鳳子，〈戀愛自由解續篇——再答 YD 先生并答王平陵章錫琛二位先生關於戀愛問題的討論〉，《婦女雜誌》，卷 9 期 2（1923 年 2 月），頁 43-45。

109 Y.D.，〈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讀了鳳子女士的『答客問』以後〉，《婦女雜誌》，卷 9 期 2（1923 年 2 月），頁 41-43。

110 章錫琛，〈讀鳳子女士和 YD 先生的討論〉，《婦女雜誌》，卷 9 期 2（1923 年 2 月），頁 48-49。

也隨之提升。她們加入記者、律師、校長、教師、作家等行列，並各自或集體透過報刊媒體，發出抵拒被政黨與國族主義收編的女性主義言論。¹¹¹ 這其中，提倡婦女職業、批評母性至上的論者，不乏挑戰愛倫凱思想以表述己見，金石音與陳碧蘭即為重要的二例。金石音在訓政初期先服務於江蘇省農礦廳，1931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學院，成為專業律師。¹¹² 她身為《婦女共鳴》創始社員與《女聲》編委，在兩刊共發表超過30篇論文，討論婦女職業、婦運、婚戀、離婚、妾制等各類女性問題。陳碧蘭在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已經鬧過學潮、取消婚約；她就讀過上海大學，曾赴蘇聯東方勞動共產大學學習，後與彭述之相戀結婚，育有一女。1927年，陳碧蘭與彭因持非主流的托洛斯基派立場，被中共開除黨籍。她以（陳）碧雲的筆名，在眾多報刊中發表論文，也於1935年出版《婦女問題論文集》。基本上，服務於政府機關的金石音，與信奉共產主義的陳碧蘭，面對當時國民政府復興母性的措施，還有社會各界紛起的婦女回家或新賢妻良母主義論，明確表達反對立場。她們不約而同將愛倫凱視為主張復興母性與反對婦女職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而藉由挑戰其學說，來闡明自己的觀點。

雖然金石音與陳碧蘭皆力主女性應從事社會職業，且先後批評愛倫凱學說所依據的兩性生理本質論，但當時可能仍單身、無子女的金石音，與已婚且有小孩的陳碧蘭，兩者對

111 Yuxin Ma,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0), pp. 255–313.

112 〈本廳職員肖像之二〉，《江蘇省農礦廳十七年度上半期工作報告》（上海：江蘇省農礦廳，1928），頁9-10；〈金石音畢業之光榮〉，《婦女共鳴》，期50（1931年6月），頁36。

母性的界定與論述重點，明顯有別。金石音在〈今后婦女的職業與責任〉中表示，愛倫凱及其追隨者，都誤將女性長久以來在父權社會發展出的「母職」，視為「自然」的性別分工結果；然而婦女被認定擅長家庭事務與照養小孩，實則是「由於習慣，而不由於天性」。¹¹³ 在她看來，母性這種「習慣成自然」的特色，並非女人的「天性」。¹¹⁴ 金石音接著更獨闢蹊徑，從非本質論出發，闡述男女的生理性別不應決定其社會發展，主張女性應該擺脫母性的女性主義觀點。她將愛倫凱的母性論，冠以主張「男女性質的異樣的保守主義」，堅持必須予以打破，否則男女有別、女人應致力發揚母性的迷思，將阻礙婦女職業與婦女解放的發展。¹¹⁵ 在〈擺脫母性〉一文中，金石音把男女的生理性別及其社會特質區隔開來，以此申論「母性非女性的特性，它的消長都視環境習慣為轉移」。¹¹⁶ 該文力倡女人應擺脫「母性」這個受男性加諸、社會制約的後天習性，真正探索與發展自己先天的特性，並讓男人也有機會發展「慈祥，仁愛，利他，捨己」等被社會歸結為「母性」的人格特質。她的〈擺脫〉母性論，否定愛倫凱的母性至上說，以便允許女性身心全面發展的痕跡，清晰可見。她雖曾要求政府頒布保護母權的辦法，但原則上拒絕愛倫凱及章錫琛等人「發展母性以求女性解放」的母權模

113 金石音，〈今后婦女的職業與責任（續）〉，《婦女共鳴》，期 14（1929 年 10 月），頁 6-15。

114 金石音，〈今日婦女努力的方向〉，《婦女共鳴》，期 8（1929 年 7 月），頁 3-14。

115 金石音，〈建設新社會：從男女關係之確認起〉，《婦女共鳴》，期 34（1930 年 8 月），頁 6-15。

116 金石音，〈擺脫母性〉，《女聲》，卷 1 期 17（1933 年 5 月），頁 2-4。

式。¹¹⁷

至於陳碧蘭，雖然也反對愛倫凱認定男女先天有別、社會角色各異的本質論，主張女性的發展不應被侷限於家庭領域，但她為人母的親身經驗，使她對母性的認知有別於金石音批判與拒斥的態度。陳碧蘭在〈論婦女職業與愛倫凱的母性復興〉，將愛倫凱詮釋為「她全部的思想，完完全全以獲得單純的性的自由和性的權利為滿足，並以養成母性為婦女的特殊職分」，¹¹⁸ 她強調，將育兒之責任推給婦女並不公平，因為其並不專屬女性，「更直截了當的說，是男子強迫她們去幹的」。¹¹⁹ 但是，或因陳碧蘭自己身兼職業與母職，不像金石音否認母性價值，且較著力闡明如何解決職業與母性的衝突。¹²⁰ 陳碧蘭與前述陳衡哲的論點差異在於，後者認定母職是神聖的，而前者則明白表示：「專把婦女留在家中育兒，在婦女本身上說，即會阻礙婦女心身的發達。」¹²¹ 此外，陳碧蘭也強調，健全母性絕非在家育兒即能達成，反而應讓為母之人「參與一切社會事業」，才可能以「社會人」的寬廣眼界，培養自己成為良母，並成功教養出有社會意識與責任感的子女。¹²² 陳碧蘭在提倡婦女職業之餘，不忘提醒

117 金石音，〈今日婦女努力的方向〉，《婦女共鳴》，期 8（1929 年 7 月），頁 3-14。

118 陳碧雲，〈論婦女職業與愛倫凱的母性復興〉，《女青年月刊》，卷 12 期 9（1933 年 11 月），頁 1-7。

119 碧雲，〈母性與職業〉，《現代》，卷 6 期 2（1935 年 3 月），頁 98-101。

120 碧雲，〈職業與母性的衝突〉，《現代家庭》，卷 2 期 8（1939 年 2 月），頁 9。

121 碧雲，〈母性與職業〉，《現代》，卷 6 期 2（1935 年 3 月），頁 98-101。

122 碧雲，〈母性與社會〉，《現代父母》，卷 2 期 8（1934 年 10 月），頁 7-9。

讀者仍應尊重母性，並表示：「社會對於婦女教育的設施，保護母性的身體等等，都是很重要的。」¹²³

金、陳二人對婦女職業與母性等課題的論述，呈現出愛倫凱思想在訓政中國的本土化與質變交織的演進過程。金石音雖未接受愛倫凱的母性論，卻在戀愛與性道德課題上，有條件地接受並修正她的思想，以表述自身意見。在〈道德的性道德〉(1929)這篇近 20 頁的論文中，金石音高度肯定愛倫凱以戀愛為結婚及性道德中心的理論，但批判愛倫凱犯了嚴重的思想邏輯錯誤。根據金石音的詮釋，愛倫凱靈肉一致的思想，意味著「戀愛之初必有條件，戀愛之終，成為無條件」，她據此認定愛倫凱所謂「戀愛的時限，就如人的壽命一般不可知」的「不永久性」、「無保障」之說法，與其靈肉一致的「無條件」說，互為矛盾。¹²⁴ 金石音的戀愛觀，近似前述孫嵐的論調，都高揚愛倫凱式的戀愛理想，否定當時中國社會的戀愛行為是「真戀愛」。金還反過來，以愛倫凱自己勾勒出的戀愛理想，來指責她所持戀愛的「不永久性」，及因此需存在「自由離婚」此一必要之惡的立論。對金石音而言，當「真戀愛」終得以落實在中國時，將不再需要自由離婚，因為「凡是真正的戀愛，斷沒有變更的理……因為沒有真戀愛，所以結了婚在其由假面具揭破的時候，就生離婚。因此都是不道德的。」¹²⁵ 至於陳碧蘭，則力圖提倡兒童公育等社會主義措施，以解決母性與女性職業的衝突，做為她對愛倫凱母性論的回應。

123 碧雲，〈母性與職業〉，《現代》，卷 6 期 2（1935 年 3 月），頁 101。

124 金石音，〈道德的性道德〉，《婦女共鳴》，期 16（1929 年 11 月），頁 5-17；金石音，〈道德的性道德（續）〉，《婦女共鳴》，期 17（1929 年 12 月），頁 5-11。

125 金石音，〈道德的性道德〉，《婦女共鳴》，期 16 期（1929 年 11 月），頁 16。

金石音與陳碧蘭藉由挑戰愛倫凱所發展的論述，展現出不受男性中心權威所箝制的女性本位女性主義思維。從清末到五四，婦女解放的呼聲雖日漸高張，但除了像何震（1885-1919?）的無政府女性主義者，鮮少有婦女解放論者（不論男女）以批判男性為前提，來發展其論點。¹²⁶ 國民黨訓政階段，可謂戰前女性擔任主編的報刊文化最發達之時，社會各界女性菁英分別由其專業或經驗出發，撰文抵抗男性本於國族主義、政黨組織或傳統習俗而主導的價值與兩性觀。金石音與陳碧蘭的女性本位意識，清晰地流露在她們批判愛倫凱思想的論述中。她們一面評論或批駁愛倫凱的思想，限制了女人個性發展的空間，一面直指「男性的自私」或「男子中心主義」的心態、體制與積習，是婦女解放的阻力。¹²⁷ 五四後期，章錫琛等人以母權運動做為女權運動進化版言論，與金、陳等人的女性本位意識相對照，彰顯出中國女性主義言論的眾聲喧嘩。

結語

1910年代以降，愛倫凱學說經歐美與日本雙重管道進入中國，為當時社會援用外國學理重塑婚姻、家庭與兩性關係，以及提倡婦女解放的衍申與創發性論述，奠下基礎。最初，中國論者將愛倫凱之名及其學說納入女子問題與婚姻道

126 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pp. 1-48.

127 例見金石音，〈婦女刊物的如此消長〉，《婦女共鳴》，卷4期11（1935年11月），頁3-5；碧雲，〈我的「女人」觀〉，《馬來亞月刊》，卷2期4（1937年1月），頁34-35。

德的討論脈絡中；1920年代前半期的《婦女雜誌》，則為宣揚愛倫凱學說營造多層次且相輔相成的論述體系。章錫琛及其同道中人，密集詮釋愛倫凱著作中代表性的字詞，重複引用重要文句，或置於凸顯其著作特色的語境，並深入闡述關鍵概念，策略運用其論點來發抒己見。拜這些知識男性之賜，愛倫凱的戀愛自由觀與母性神聖論，以及由此二者共同構成利己利人、優生進化的新性道德理想，在中國發揮相當程度的思想影響。在介紹與闡釋愛倫凱學說的過程裡，中國論者進而透過各自的經驗、觀察與反省，對她的思想進行了選擇性且豐富多樣的文化轉譯。

愛倫凱的戀愛自由論，厥為民國社會改變兩性社交、婚戀與家庭關係的首要思想來源。不少中、日論者都尊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為觸及婦女問題與婚戀自由之首，但他們尤其推崇愛倫凱的著作，更深入、大膽而徹底地闡述易卜生揭櫫的個人主義理念，並將它們提升至實現小我進而兼善天下的更高層次。在追隨愛倫凱的中、日論者眼中，她賦予戀愛前所未有的道德高度與社會價值，使戀愛成為解放兩性、調和社會與進化種族的核心理念。愛倫凱思想中，最為民國社會接受的，堪謂「靈肉一致」的戀愛理念。雖然通俗文學或市井言論中視戀愛等同淫蕩且有傷風化的敘述，不絕如縷，但從發表論見的知識階層到接受新式教育的一般市民，皆已普遍認同戀愛是靈肉一致的觀點。即便有論者（無政府主義者除外）認為戀愛實踐導致問題叢生，為求救濟而主張反（假／準）戀愛，她／他們也未曾否認愛倫凱「完成人格、保存種族」的戀愛理想。在中國，愛倫凱戀愛觀的文化轉譯，主要顯現在針砭戀愛從理想落實到生活中的質變，及由此派生的修正

論點。因此，從歷時性的角度觀察，民國社會涉及愛倫凱戀愛觀的言論，大致從強調戀愛的理想與神聖這種抽象的闡述，轉化為針對青年男女濫用戀愛的務實性批判。

作為愛倫凱自由婚戀出發點的母性說，在民國社會論述中更具爭議性，但重要性並不亞於她的戀愛論。學者之前多半忽略愛倫凱戀愛論的終極實踐—完成人格結合，促進種族進化—與其母性論實息息相關。本文援用的眾多史料顯示，愛倫凱的戀愛觀與母性論，形塑《婦女雜誌》革新期的兩性論述，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愛倫凱母性論在中國的文化轉譯，主要朝兩大方向進展：一是女權尚未爭取到的情勢下，就鼓勵女人透過實踐母職，追求解放，此說多出於男性作家；二是在反對兩性分化說的前提下，質疑母性論，並主張婦女出外就業，女性作家多持此說。母性、母職與母權，也在男女作者的言論中，被拆解分殊、做重點各異的闡述；母性的本質與母職的角色扮演，人言言殊，但幾乎所有提及母權的論者，都主張政府保障母權的必要性。

從較宏觀的視野出發，本文研究愛倫凱學說在中國的演變趨勢，著重考察其性別化的文化轉譯過程，以求更深入理解女性主義、婦女解放與女權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我從時空與性別兩個軸端，擴大先行學者的研究向度，藉此展現民國時期女性主義高度異質化的思想光譜。這個光譜清楚顯示，中國男女知識菁英受愛倫凱學說的戀愛與母性論啓迪，從母性、女性與人性的輕重之別出發，所開展的女性主義論見，亦各有不同的立場與目標。由上文討論可知，我所指涉的「男性本位」與「女性本位」，主要乃根據論者如何面對既有「兩性分工」的文化體制，來形塑女性發展方向及社會角色。本

文的研究顯示，愛倫凱學說在 1920 年代前半期催生「從戀愛來解放女性」與「發揚母性」的男性本位母性主義思維。此一思維展現的意識特質，是在兩性分工賦予男性優勢不變的前提下，透過自由婚戀與優生母性，來解決婦女問題。《婦女雜誌》中強調「男女和諧共促社會進化」，或「著眼於（由男性代表的）全人類的生活」，提倡母權的婦女解放觀，並未如王政所言，有改變男性中心價值觀的意圖。¹²⁸ 本文的性別化分析，明確辨識出在父權體制根深蒂固，與性別框架賦予優勢下，男性論者發展的「女性主義」蘊含男性本位思維；這裡所指的女性主義包括王政所謂的「自由派女性主義」，與白露所稱的「進步派女性主義」(progressive feminism)。愛倫凱思想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就是允許章錫琛等菁英男性，發展出利己利人的「母權」此一思想武器，取代或概括其認定只求女人私利的「女權」或「人權」主張。

從共時性的全球脈絡來看，當時的歐美，相較於中國，具文化優勢；在跨文化的論述階序中，審視國內外發展的女性主義，可發現以愛倫凱為代表的外國女性學說，論述高度較高，文化層級在中國男性之上，不需受其規範。¹²⁹ 章錫琛等《婦女雜誌》論者，接受愛倫凱終身未婚、無子女的事實，甚至為此辯護，卻執意要求中國女性發揮母性，並批判有意獨身的女性，其實暴露出中國男性揚外國女性而抑中國

128 記者，〈我們今後的態度〉，《婦女雜誌》，卷 10 期 1（1924 年 1 月），頁 2-7；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p. 104.

129 關於近代中國翻譯女權論述在跨文化權力階序中的複雜發展，見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臺北：學生書局，2000）。

女性的差別待遇。¹³⁰ 這些菁英男性自居為闡釋愛倫凱學說的論述權威，只重擇取有助他們挑戰傳統禮教與改造社會的元素，然而愛倫凱以發揮女人與生俱來的母性優勢，挑戰男強女弱性別觀的意念，卻被有意地淡化、忽略。近代中國菁英男性這類具性別化意涵的文化轉譯，充分顯露他們主導婦女解放課題時，自我保護的改革意識與男性中心的社會關懷。

本文徵引的眾多史料，更揭露一群過去鮮為學界討論的知識女性，如何透過回應愛倫凱的學說，提出男女有別的「女性本位女性主義」主張。從歷時性的順序來看，章錫琛主編的《婦女雜誌》，所體現的「男性本位母性主義」思維，堪謂愛倫凱啟發中國的首要女性主義論述；但愛倫凱帶給中國的思想洗禮，遠不止於此。1920年代以降的二十餘年間，民國作者持續依違於其學說的辯證思考中，開展更多元的女性主義論述。在章錫琛領銜的《婦女雜誌》階段，某些異議已然發聲，如蔣鳳子批判婚制、贊成獨身選擇等反體制言論的「女性本位女性主義」，或陳德徵只強調女性職業、卻未挑戰兩性分工的「男性本位女性主義」思維。從陳衡哲到金石音、陳碧蘭或孫嵐等知識女性的立論，更清楚審度女性、母性與人性孰輕孰重，以重新衡量兩性分工合理性的女性本位女性主義思維。陳衡哲辭去大學教職後，由於家庭經濟條件允許，得以聘請傭人與保姆分擔家務，自己則一邊養育小孩，一邊從事她稱為「與家務不相衝突的事業」的「文藝創

130 原田實著，幼彤譯，〈唱母性尊重論的愛倫凱女士為什麼獨身〉，《婦女雜誌》，卷8期10（1922年10月），頁12-15。

作」，以求結合「性別人格」與「個人人格」的發展。¹³¹ 陳衡哲不區隔生育與養育的母職概念，與愛倫凱的母性論相呼應，期許已生育的女性仍應發揮中國傳統的「犧牲」美德，善盡母職。愛倫凱的新學說，描摹女性以「種族母親」自居所具有的優勢，陳衡哲則提出平衡為人與為母的女性人格發展、但母職無可替代的見解，她們秉持女性本位的論述，皆呈現重母性的女性主義傾向。況且，愛倫凱或陳衡哲的女性主義訴求，都需倚賴國家（支付津貼）或他人（保姆與傭人）的協助才得達成，對於家計艱困、必須出外工作的女性來說，只是遙不可及的理想。

相對而言，從蔣鳳子到金石音與陳碧蘭等知識女性，則質疑既有的兩性分工價值觀，清楚展現其批判傳統與抵拒中外權威的女性本位女性主義思維。蔣鳳子基於自由選擇勝過戀愛結婚的概念，發表女性具有獨身與不婚不育自主權的看法。她的數篇短文雖未深入闡述自身理念，卻已明示她不願隨愛倫凱及章錫琛等崇揚母性的論調起舞，也無意固守兩性分工秩序中女性的妻母之責。1930年代的金石音，以「不妨不婚」的論見挑戰愛倫凱及其追隨者，並進一步提出女性應擺脫母性、且讓男性也發展母性的非本質論述。男女的生理與社會角色，既有的分工秩序刻板僵化，金石音的創議企圖鬆動這種成見，可說深具「女性本位女性主義」思維。與金同時期的陳碧蘭，除了質疑家務與教養小孩為何須獨責之於

131 陳衡哲，〈婦女與職業（婦女問題之一）〉，《現代評論》，第二周年紀念增刊（1927年1月），頁72；張朋園、楊翠華、沈松僑訪問，潘光哲紀錄，《任以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92-97。

女性，更依其社會主義思想，提倡推翻資本主義與男性中心的家庭體制，以此追求女性的全面解放。陳碧蘭從女性的自主與能動性出發，主張從家庭到社會的全面改革，既有別於其他中共人士缺乏女性意識的社會革命與婦女解放觀，也不同于章錫琛等男性本位的母性主義論，鮮明地展現其女性本位的女性主義。

綜言之，在民國男女進行社交婚戀的想像與實踐過程中，愛倫凱的學說對於男女平等、自主人格與優生進化等原則確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她的立論，既曾啓迪基於戀愛自由與尊重母性原則的論者，提倡母權運動，也刺激某些論者解構戀愛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係，強調以人權為重的社會大業，還引發其他論者出於對母性論的反彈，主張包括婦女職業在內的全方位女權觀點。追溯愛倫凱思想在中國造成的影響，實為更深入了解中外新舊元素交織出的多元女性主義及彼此間的競逐，開啓研究的新序幕。

徵引書目

一、報刊

- 《女子月刊》（上海），1936-1937。
《女青年月刊》（上海），1933。
《女聲》（上海），1933。
《中央日報婦女週刊》（南京），1947。
《中華周報》（上海），1932。
《民國日報》（上海），1921-1931。
《民鐸》（東京），1926。
《宇宙風》（上海），1938。
《江蘇省農礦廳十七年度上半期工作報告》（鎮江），1928。
《吾友》（北京），1941。
《東方雜誌》（上海），1920。
《馬來亞月刊》（新加坡），1937。
《婦女共鳴》（南京），1929-1935。
《婦女雜誌》（上海），1919-1931。
《教育通訊》（漢口），1943。
《教育雜誌》（上海），1914。
《晨報副刊·家庭》（北京），1926。
《現代》（上海），1935。
《現代父母》（上海），1934。
《現代家庭》（上海），1939。
《現代評論》（上海），1927。
《新女性》（上海），1927-1929。
《新文化》（上海），1927。
《新青年》（北京），1918。

- 《新潮》（北京），1919。
《獨立評論》（北京），1935。
《橋李》（上海），1919。

二、專書

- 王政、高彥頤主編，《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 沈君默，《現代女性》。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2。
- 沈茲九編，《世界女名人列傳》。上海：中華書局，1936。
- 金仲華，《婦女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柯惠鈴，《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 洪瑞釗，《革命與戀愛》。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
- 茅盾，《茅盾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 徐國定，《現代女名人傳》。上海：大東書局，1946。
- 張朋園、楊翠華、沈松僑訪問，潘光哲紀錄，《任以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張寧，《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
- 教育總署編審會著，《高中女子修身（第三冊）》。北京：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41。
- 郭真，《結婚論 ABC》。上海：ABC叢書社，1929。
- 郭真，《戀愛論 ABC》。上海：ABC叢書社，1929。
- 麥惠庭，《中國家庭改造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愛倫凱著，朱舜琴譯，《戀愛與結婚》。上海：光明書局，第二版，1926。
- 楊聯芬，《浪漫的中國——性別主義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 雷萌，《戀愛手冊》。上海：經緯書局，1944。

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臺北：學生書局，2000。

Barlow, Tani.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Key, Ellen. Translated by Francis Maro. *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9.

Key, Ellen. Translated by Arthur G. Chater. *Love and Marri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1.

Key, Ellen. Translated by Namah Bouton Bothwick. *The Morality of Women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The Ralph Fletcher Seymour Co., 1911.

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Liu, Lydia H., and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Ma, Yuxin.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0.

Pan, Lynn.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Rivkin, Julie, and Michael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17.

Sunderland, Jane. *Gendered Discours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三、論文

- 白水紀子，〈《婦女雜誌》所展開的新性道德論——以愛倫凱為中心〉，收入吳俊編譯，《日本現代中國文學論：東洋文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 507-527。
- 克士，〈戀愛與貞操〉，收入生活書店編譯所，《戀愛與貞操》，上海：生活書店，1933，頁 1-6。
- 呂芳上，〈1920 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 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73-102。
- 徐仲佳、張光芒，〈欲望與理性悖論的調適——論中國現代文學的「革命+戀愛」思潮〉，《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期 2，2005 年，頁 27-32。
- 張霞，〈愛倫·凱教育思想研究〉。山東師範大學教育史碩士論文，2008 年 4 月。
- 張鵬燕，〈愛倫凱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河北學刊》，卷 32 期 5，2012 年 9 月，頁 101-104。
- 張鵬燕，〈愛倫凱與中國 1920 年代女性解放思潮〉，《河北學刊》，卷 33 期 6，2013 年 11 月，頁 100-103。
- 張鵬燕，〈愛倫凱與中國現代文壇〉，《新文學史料》，期 1，2013 年，頁 159-168。
- 張鵬燕，〈論愛倫凱與茅盾女性觀與創作的影響〉，《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40 期 6，2013 年 11 月，頁 155-157。
- 眭淺予、羅宣，〈陳衡哲的母職觀及其中西文化溯源〉，《文史博覽（理論）》，2009 年期 8，2009 年 8 月，頁 25-29。
- 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

- 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29-92。
- 許慧琦，〈愛與慾的辯證——從愛瑪·高德曼在中國的譯介談北伐前後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愛論述〉，《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18，2020 年 6 月，頁 269-318。
- 陳相因，〈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 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2011 年 12 月，頁 1-31。
- 陳相因，〈嫵嫩、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學——論〈三代之愛〉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跨文化實踐與文學實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54，2019 年 3 月，頁 75-113。
- 陳雁，〈從矛盾的翻譯到矛盾的立場：女權主義術語在近代中國的翻譯與流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1，2013，頁 105-114。
- 黃嫣梨，〈中國近代史上的革新婦女——陳衡哲的女性意識〉，《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0 期 4，2004 年 7 月，頁 1-3。
- 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 5，2012 年，頁 87-101。
- 趙季芬，〈我對戀愛和貞操的意見〉，收入生活書店編譯所，《戀愛與貞操》，上海：生活書店，1933，頁 31-35。
- 趙雅研，〈「五四」時期愛倫·凱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9 年 5 月。
- 劉慧英，〈從《新青年》到《婦女雜誌》——五四時期男性知識分子所關注的婦女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期 1，2008 年 2 月，頁 118-126。

錢阜虞，〈不是無意義的壓迫〉，收入生活書店編譯所，《戀愛與貞操》，上海：生活書店，1933，頁 42-47。

魏雲，〈民初女子參政失敗原因考察〉，《湖南科技學院學報》，卷 30 期 3，2009 年 3 月，頁 25-27。

Chiang, Yung-chen. "Woman,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25," *Gender and History* 18:3 (November 2006), pp. 519–545.

Lengborn, Thorbjörn. "Ellen Key (1849-1926)." *Prospect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23:3/4 (1993), pp. 825-837.

Levý, Jiří.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48-159.

Dahlgren, V. Tatiana. "Ellen Key in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Kyoto Conference on Japanese Studies 1994 III*, March 25, 1996, pp. 261-269. <http://doi.org/10.15055/00003561>.

四、網路資料

〈在地化〉，MBA 智庫百科，<https://wiki.mbalib.com/zh-tw/%E5%9C%A8%E5%9C%B0%E5%8C%96>，擷取日期：2021 年 8 月 14 日。

Ellen Key in China: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Gendered Discourses

Rachel Hui-Chi Hsu *

Abstract

Moving beyond earlier studies on the Swedish educator Ellen Key (1849-1926) in China, which concentrate on the May Fourth era, fictional works, and male discours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ng Key in Republican China with such new approaches as *longue durée*, diversified sources, and two gender discourses. While probing into the Chinese authors' selection, adaptation, (mis)conception, contextualization, and criticism of Key's thoughts, I also conduct gender analysis of their reception and responses so as to highlight the variety of feminism in the Republican era. For the sake of better grasping gendered notions in the writings of Chinese authors, I categorize their works into "male-oriented" and "female-oriented" feminist discourses rather than following such (male-centered) conventional classification as liberal or socialist feminism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Republican male and femal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uthors developed a diversity of feminist and gender discourses, which highlighted maternal rights, female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respectively, by responding to Key's theory under the intersectional context of traditional and new fa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Among these discourses, Ellen Key's view of romantic love and motherhood not only became the primary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ese male-oriented feminism during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era, but also inspired the female-oriented feminist thinking that was neglected in previous studies. A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various discourses that constituted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of the reception of Key's ideas, ranging from fully embrac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m to harshly criticizing and rejecting them, demonstrates the acceptance, reflection, and creativity of Republican intellectuals in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foreign theories.

Keywords: Ellen Key, feminism, romantic love, motherhood, cultural translation